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24 期  
2001 年 3 月 15 日

### 本 期 要 目

#### 【学科建设】

试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

马 戎

#### 【译文选编】

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序言）

Pettigrew, T.F. 著 任道远译

详析差异，寻求和谐：贝利兹内种族、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建构

Laurie Kroshus Medina 著 高翔译

#### 【学术动态】

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即将在兰州召开

#### 【学术纵横】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2000 年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学科建设】

# 试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

马戎

种族和民族问题是自人类文明开始出现、人类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即存在的最古老的问题，也是当今最敏感的世界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一。随着全球性贸易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人口流动，不论是发达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各国的种族冲突和民族问题不但没有弱化，而且有不升级的趋势，并且在内外政治、宗教势力的共同作用下，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导致武装冲突甚至区域性战争。社会学是关注社会变迁、研究社会问题的具有很强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也必然使得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关注对于种族、民族问题的研究。

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里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最初是作为一门课程开设，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逐步发展成为欧美各大学社会学系中的一个专业方向，形成了从社会学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种族和民族问题的特殊领域。

美国全国性的社会学学会里设有十几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一个“种族与少数民族研究”委员会。在每年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中，至少都有一个分会场来讨论“种族与少数民族研究”的专题。在美国社会学学会 1990 年编辑印刷的“Teaching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Syllabi an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Second Edition)中，介绍了全美国 37 所大学有关民族和种族研究的课程大纲，而这当然仅仅是各校开设民族社会学课程的一小部分。欧洲许多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系也设有这一专业方向。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个专业方向的发展规模。在国际社会学界里，种族、民族研究这个专业领域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在理论上、方法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特点，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和专题。

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自 50 年代初期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一度停顿，直至 70 年代后期才开始着手筹备这个学科的重新恢复。自 80 年代以来，许多在 50 年代之前就有一定基础的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如社会发展理论、家庭婚姻、劳动、人口、社会分层、犯罪和越轨、社会组织、企业变迁、社会福利与保障、社会心理学等等在新的条件下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相比之下，80 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对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中国解放前虽然一些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学者从事过少数民族的研究（如李安宅、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等，参看杨雅彬，1987：292-299；韩明谟，1987：142），但是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领域，而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在西方各国兴起于 60 年代前后，在当时的条件也没有能够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直至 80 年代后期还没有在我国真正形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民族自治的地域占全国陆地领土的 64%，我国在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着许多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无论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从当代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验看，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自 50 年代以来一度缺乏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对国外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新发展了解不多，所以非常有必要将国外研究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来，以促进国内的研究工作和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并且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使

民族社会学逐步在中国社会学的领域内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专业研究方向。

## 一.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主要内容与方法论特点

大致地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戈登(Milton M. Gordon)于1964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地回顾了自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处理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的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认为,美国处理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Anglo-conformity”(盎格鲁-萨克森化),以强化早期移民主体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中心;第二阶段叫“Melting-pot”即熔炉(主义或政策);第三阶段叫“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多元主义。在这些讨论中,贯穿了对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分析和对于民族融合-同化的模式与变量的讨论。

另外一本较有影响的是由格莱泽(Nathan Glazer)和莫尼汉(Daniel P. Moynihan)于1975年主编的《民族》(*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这本文集中各篇的作者都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种族、民族问题的著名学者(包括Talcott Parsons, Milton M. Gordon, Donald L. Horowitz, Harold R. Isaacs, Daniel Bell等),从各个角度特别是从宏观理论方面讨论了人类社会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史密斯(Anthony D. Smith)于1991年出版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则是90年代从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上讨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力作,从西欧和东欧地区族群和社会演变的历史来探讨“Nation”在各个地区和不同文化中的实际含义以及“Nationalism”在今天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其他如雷克斯(John Rex)和梅森(David Mason)主编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理论》(*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等,也是目前各大学民族社会学专业常用的基本教科书。

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主要是偏重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

(二) 关于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

这种结构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把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应用于研究种族、民族关系。如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尔(J. Milton Yinger)主编的《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这本书各个时期的修订版由Plenum Press定期出版。这类研究主要利用美国的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族群在教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宏观发展状况以及美国政府关于种族、民族政策执行的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族群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族群成员之间的体质、文化认同使族群很容易成为社会动员的单位,所以这些利益冲突有时以族群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Glazer and Moynihan, 1975: 7)。如果族群之间没有明显的社会结构差异,族群矛盾就会被控制在文化领域而不会危及整体性的社会结构。根据普查和大规模抽样调查所提供的这些系统具体的统计资料,社会学家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国家各个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演变。从事这类研究的主要是具有社会学、人口学学术背景并擅长统计方法的学者。

(三) 关于人们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

在拥有大量移民的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移民及其后裔在文化及族群认同方面的转变成为部分学者的研究专题,例如沃特斯(Mary C. Waters)于1990年出版的《族群选择——在美国的认同选择》(*Ethnic Options: 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主要通过系列的个案访问,从被访者(多数为族际通婚的后裔)的访谈记录中来理解分析他们在族群认同方面的变化、困惑和做出选择的原因。有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被访者的自身族群认同、有的是族群成员日常的社会网络,从事这类研究的大多是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术背景并擅长访谈方法的学者。

(四) 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

常见的研究专题包括:(1)语言使用,(2)人口迁移,(3)居住格局,(4)族际通婚,(5)民族意识,(6)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分析(如历史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宗教组织、个别事件、政策因素)等等。关于这些专题的大量实证研究,在规模上始终是西方民族社会学研究文献的主体,而且经常使用跨区域比较研究、历史变迁研究等方法。如从人口学角度系统研究族群差异和民族关系的有比恩(Frank D. Bean)和弗里斯比(W. Parker Frisbie)共同主编的《种族、民族群体的人口研究》(*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从政治组织和政治冲突角度来研究族群关系的有霍洛维茨(Donald L. Horowitz)于1985年出版的《冲突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而研究城市族群居住格局的经典则是托伊伯(K. E. Taeuber and A. F. Taeuber)于1968年出版的《城市中的黑人》(*Negroes in Citie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这类对于不同专题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参看马戎编,1997)。

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关系各有特点,发展的进程也有各自不同的主导因素,所以因地制宜地选择在当地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专题,可以有助于理解和分析该地区民族关系的核心命题和关键的影响因素。总的来说,只有在大量的实证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民族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才有可能建构。

从学科建设特别是课程教学的角度来看,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2)民族及族群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3)多民族社会的民族关系发展目标,(4)民族集团的结构差异分析,(5)衡量民族关系的主要变量,(6)民族关系专题研究,(7)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演变,(8)政府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这些方面兼顾了理论、方法、专题研究和应用性的政策分析。学生了解了这8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就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根据教学的需要,我们把在北京大学开设“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主要英文参考文献,组织研究生翻译校对后汇编为《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于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供国内关心民族社会学的同人作为参考。

研究民族的学科很多,如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如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迁移)、历史学(民族史与民族交往史)、政治学(不同民族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政治外交史等)、民俗学(比较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宗教的差异)、经济学(如民族经济交往的类型及发展方向)等等,它们都涉及到民族的研究。我把民族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总结为十个特点:(1)强调现实而非历史,即主要关注现实的民族问题;(2)强调民族

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各个民族集团自身；(3) 注意结合个人与集团两个层次；(4) 比较注重各种因素的综合研究；(5) 在尽可能综合和忠实地描述的基础上，力图解释种种关系的形成与发展；(6) 注意吸收、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7) 注重实证研究；(8) 结合政策研究；(9) 结合区域发展研究；(10) 关注一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总的发展趋势。以上这十个方面大致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特点。

## 二、中国民族社会学目前的研究工作

如果我们参考上面提到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研究文献的四个主要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国内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 (一) 民族社会学关于族群、族群关系的理论。

民族理论涵盖的范围包括“民族”定义、民族意识的产生和传递以及民族关系演变理论等内容。在 80 年代之前，中国的民族定义、族群关系理论（或称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主要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影响，很难说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系统理论。要想真正建立和发展以中国历史和国情为基础、同时也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族群理论，我认为需要与我国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三个理论与实践来源各自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试图综合这三个方面中符合今天中国国情的内容和思想，逐步创立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理论体系。

这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来源是：

#### 1. 中国历史传统上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学说中关于“人种”、“类”有它们一套说法和看法。如“非我族类”、“蛮夷”等。它关于非汉族、非中原的其他边缘地区民族和部落的文化，有一套称谓、一套观点。它既有包容的一面即所谓“化内”，认为这些种族是可以为中原文化同化进来的，而且对他们采取一种平等的态度；同时对所谓“化外”则采取明显的歧视态度。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是整个东亚地区发展最早的，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各国的态度是与这种地理文化结构分不开的，是一种同化的、安抚的而非侵略的政策和策略。因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地域广阔，对中原王朝形不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发动侵略战争，就涉及派驻军队等一系列问题，而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收获，得不偿失。因此这种态度与欧美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费孝通教授把我国几千年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族群关系，从理论上总结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这些传统对今天的中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可能这种方略仍然有符合实际的地方，必须为我们了解和借鉴。但是，中国的历史有其特殊性，“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只能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族群关系。而且，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的族群关系也必然会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

#### 2. 欧美各国关于民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论。

欧美社会学界关于民族关系的宏观理论，主要集中于关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戈登（Milton M. Gordon）关于美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还有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著作《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该书针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发达的核心地区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理论，一个是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一个是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欧洲各国的学者们也在结合来自前殖民地的异族人口和外来工人的发展状况，努力探讨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框架。这些工业化国家的族群问题，与现代化社会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演变等密切相关，有关的理论探讨对于我们今后理解和分析中国的族群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移民国家（如美国）的族群理论，不能说是带有全球共性的民族理论，反映的只是这些西方国家的国情。

### 3. 前苏联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理论。

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与共产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前苏联意识形态体系中关于民族问题方面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的理论，一是区域自治，一是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自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如何制定其民族政策，它准备如何规划和指导境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其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方面的文献，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对于研究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其对建国后我国政府处理民族关系具体政策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总的来说，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上体现的是位居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的民族关系的格局和发展历史，加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意识形态。应当说也是一个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民族理论。

1985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康纳（Walker Connor）的书：《马列主义理论战略中的民族问题》（*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该书收集了从苏联最早的有关文献（包括很多谈话记录）以及中国共产党从江西时期开始一直到他写书时所发表的很多资料，并加以考证和详细的论述。书中以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为例，首先提供各国民族关系的旧貌，再论述现在的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如何制定其民族政策的（这里边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其各自的民族关系演变成怎样一个格局（新貌），以及现在这种关系格局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尽管该书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搜集的资料并不很全面完整，但却是在西方出版的比较详尽地论述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策略的一本书，可供参考。

目前，西方的民族社会学家们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是本国的种族和族群冲突，他们对于俄罗斯、中国等地域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传统文化和族群关系演变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从以上这三个方面充分吸收理论营养和智慧，总结出能够涵盖各个地域族群关系的更为宏观、能够概括出人类族群关系的带有普遍共性的族群理论，那么我们不但可以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在世界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而且有可能超越目前西方民族社会学，为人类的学术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关于族群关系演变的理论，与“全球化”、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理论等社会学宏观理论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也将会做出贡献。

#### （二）关于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

应当说，我国各级政府的正式统计资料中很缺乏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和社会统计。在每 10 年举行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政府会公布一些以民族为单位的关于年龄、性别、产业、职业、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基本数据。除此之外，各年度的统计资料都是以行政区划（省、市、县）来进行统计的，无法对各地区的民族分层情况进行分析。其他年份开展的各种抽样调查也没有公布过以民族为单位的统计资料。当然，对于一些相对属于单一民族的行政地区（如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中藏族占 96%），以行政区划单位统计的数据，可以粗略地用来代表该地区族群的情况，以进行推算和比较，但这些比较毕竟是很粗略的分析，达不到科学研究的要求。在这个方

面，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我国的统计部门在今后能够重视以民族为单位的统计，并且能够向我国的社会学家们提供有关的统计资料。如果政府部门或国家支持的社会科学基金能够拿出相当大的资金来支持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这也将是政府年度统计或普查数字的重要补充，而且由于政府年度统计或普查问卷只能涵盖相当有限的项目，为了开展深入和系统的专题研究，这些抽样统计调查是非常必须的。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学家在我国族群的社会、经济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方面，才有可能做出与西方社会学家们相同的研究成果。

### （三）关于人们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

在这个领域，我国的民族社会学者有大量的研究工作可以去做，这些工作可以具体地从三个方面入手。

1. 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和分析中国古代、近代人们对于“族”、“民族”这些群体划分的定义、思想和应用。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家、学者、思想家、文人所撰写并流传下来的，直接反映的是作者个人的观念和思想，间接地（通过表示认同或批评）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和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韩锦春、李毅夫两位学者编辑了《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1985）一文，是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出的极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个材料所收入的资料范围还比较小，我国古代、近代大量文献中的有关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同时对于这些文献的摘录资料没有进行分析。此外，所包括的范围除了直接涉及“族”、“民族”这些词汇的文献外，对于实际上涉及族群分野、族群认同方面观念的文献（如对于“华夷”的论述、对于各个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论述）也应当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在这个方面，今后还有大量细致的文献检索、整理、分析工作需要去做。

2. 对于当前社会中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民族”的概念和自己的族群认同，进行访谈调查。如长期在汉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民族，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没有接触的汉族，与汉族没有接触的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男性或女性等等，这些处于不同情况的人们对于如何看待“民族”、看待自己与哪个群体的认同，很可能会有十分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而且这些观点可能在他们一生中不同的时期，随着自身经历的变化而有所转变。详细和深入地记录下与他们的交谈，分析各种观点和它们的实际含义，分析产生各种观点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分析他们观点转变的过程和影响因素，并且把不同人、不同群体的情况相互进行比较，这些分析将十分有助于我们从个案和微观层面来理解人们的“族群”观念和他们的群体认同。

3. 在第二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在国内进行的访谈，访谈对象都是我国公民，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制度下，经历过相似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第三个方面是与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华人、留学生进行访谈，他们目前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制度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很不相同，但他们或多或少都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根”。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对于“族群认同”的观念和演变，对于理解国内人们的“族群”观和认同观，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提供参考系。

这与美国学者对于移民的访谈研究在方法上是相近的。一个人远离自己的“祖国”和“母体文化”，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适应、接受甚至努力“融入”另一种陌生的文化和社会观念，对于着种感受和转变的记录和分析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对于移居国的主导文化，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移民的接受速度和抗拒心理也是不同的，在美国，来自西欧的移民肯定比华人移民要更快地适应，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与来自大城市的

汉族移民在适应美国文化方面的表现可能也有不同之处，这些不同角度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确定哪些是中华民族在族群观念和认同方面更为基本的东西，哪些是汉族具有而我国少数民族并不具有的东西。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在进行过程中，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从而在微观层面和感性层面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汉族、少数民族）的“族群”观和认同观。

（四）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

这部分应当是我国民族社会学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最需要开展、也比较容易做出成绩的研究工作。在专题或个案的实证调查研究中，涉及的地域或人口范围可大可小，涉及的研究专题可宽可窄，涉及的历史时期可长可短，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使用的定量统计方法也可深可浅，这些都可以视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专业训练、知识积累、研究兴趣等而具体确定，有很大的自由度。以目前我国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队伍的实际状况来看，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应当是被最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

对于具体研究专题的选择，我们可以参考西方民族社会学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学术传统和经典研究。我们考虑，有六个专题可以集中反映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可供研究者优先选择。

1. 语言使用。这个研究专题的实地调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调查地区不同族群成员使用本民族语言及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2）人们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主要途径（学校课程还是日常接触），（3）人们使用各种语言的场合（家中、学校、一般社交场合、正式官方场合如法庭诉讼、政府会议等），（4）政府的语言政策（包括学校中教学语言的政策）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实际影响，（5）不同代际在语言学习和使用方面的差异，（6）少数民族语言的演变及其对现代化社会的适应（词汇和语法的变化）。以上这6个方面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在多民族地区各个族群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基本状况（pattern），说明其变化的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的发展方向。

语言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戈登1964年提出的衡量族群融合的七个变量中，第一个就是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或译做“涵化”。所以关于语言使用的调查是研究民族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专题。

2. 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会直接导致一个地区内各民族人口相互比例的改变，增加对迁入地区自然资源的压力，导致各族群在生存与发展机会方面的竞争，而这种经济利益的竞争往往与族群之间在政治权力方面的竞争以及文化冲突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研究民族关系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查人口迁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1）移民的数量、迁入时间和迁移形式（个体、家庭、群体、政府安置等），（2）移民的行业、职业结构，（3）移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4）移民整体收入、内部分层结构跟当地居民之间的比较，（5）移民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地区总产值、居民总收入以及学校、医院、对外贸易的影响），（6）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通过对于这些方面的调查，我们可以分析人口迁移对于一些移民规模较大的地区（如有大批汉族迁入一个非汉族地区，或是大量B民族人口迁入以A民族为主体的地区）的族群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3. 居住格局。居住格局是社会交往客观条件的一部分。社会交往简单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如在学习场所、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宗教场所、居住场所的交往，其中之一就是居住场所里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即各个族群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空间分布模式（各族群在空间上是否相互



隔离，各族群成员是否彼此聚居)。这是美国人调查研究城市族群关系的基础性专题。在具体的调查分析中，美国学者提出予以定量计算的“Index of Dissimilarity”(“分离指数”)，通过各街区民族比例与总体民族比例的差别计算得出，这个指数直接反映了在居住方面种族、民族隔离的程度，并间接反映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的状况。通过不同时期的追踪调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族群空间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以及探讨造成变迁的原因。

自1988年以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已经在有计划地组织对我国重要的多民族城市开展居住格局的系列专题研究，到2000年已经先后完成了对拉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南宁这5个自治区首府城市的调查，研究报告已经发表，同时对西宁、昆明、北京的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调查报告汇成专集出版，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社会学研究者对居住格局的调查与研究。

4. 族际通婚。这是度量民族关系最重要的变量，也是戈登提出的衡量族群融合的七个变量之一。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通婚和混血后裔的产生，族群才会逐步实现血缘的融合。我们在调查研究时，要特别注意把个体通婚和规模通婚作为两个不同的层次既区别开来又要相互结合。在族际通婚方面可以开展调查的方面有(1)通婚的绝对和相对规模，(2)通婚发生的时间，(3)通婚中是否有性别选择或事实上的性别倾斜，(4)通婚者群体与非通婚者群体在各方面(年龄、教育程度、行业、职业、家庭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是否移民)的结构比较，(5)在两个以上族群共同居住地区，在族际通婚中是否有族群选择，(6)通婚后所生子女在族群身份认同方面的选择，(7)政府对于族际通婚的政策，(8)家庭或社区对族际通婚的态度，(9)混血子女在个人发展机会方面与各族群非混血子女之间的比较，(10)鼓励或阻碍族群通婚的各项因素(宗教、语言、生活习俗、族群偏见、交往机会等)。通过对民族集团间通婚的实际情况的调查，通过对与异族结婚的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人员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并可以从当前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和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

5. 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人们后天生成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人们的认同意识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强化或弱化。这个专题的研究与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大方面(微观层次的民族意识调查)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有计划地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对于当前社会中不同情况、不同背景的人对于“民族”的概念和自己的族群认同，进行访谈调查。我们在进行访谈调查时，需要结合场景的变化和人们的社会经历来确定人们民族意识的内容与程度，分析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刺激因素。

6. 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大致划分为六大类：

(1) 民族集团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对现今关系的影响，或称为历史因素。民族间过去是否长期融洽或争战，历史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员的交往方面是什么情况，会影响现今的民族关系；

(2) 社会制度的异同(社会因素)：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家族传统对于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肯定有限制。解放时西南地区一些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也与汉族地区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异对于族群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经济、社会整合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经济活动类型的异同(经济因素)：如汉族的传统经济活动是农业，蒙古族是草原畜牧业，回族善于经商，当他们相遇共处时，这种差异在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无疑是有影响

的，并进而影响民族关系；国外的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也都有传统的经济活动。这种族群在一定行业或职业上的集中或倾斜，甚至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族群分工”。

(4) 文化、宗教、语言、习俗方面的差异(可笼统地称为文化因素)，对于一些民族而言，宗教因素特别重要，而且与生活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文化因素在各个族群中的强弱程度不同、持续性也不同，它们如何具体影响一个地区各族群之间的交流，需要深入地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5) 个别事件(偶发因素)有时会强烈刺激民族感情，影响民族关系，如印度针对锡克族的“金庙事件”和甘地总理被刺明显恶化了印度的民族关系；我国历史上和近期发生的民族冲突也会对当地的民族关系留下负面的影响。但是同时，一些体现了民族团结的事件和人物的出现，也会对当地的民族关系带来正面的积极影响。

(6) 政府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政策因素)。这个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突出并成为重要的研究专题。政策既包括立法(如《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包括各种政策，如干部政策(如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经济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等)、文化教育政策(如宗教政策、语言文字政策、学校制度等)及处理个案的一些具体政策等。毫无疑问，在一个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政府的上述政策将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专题或个案调查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详细和深入的研究素材，有助于我们分析形成当地民族关系现状的原因，并进而分析预测未来民族关系的演变趋势。也是我国民族社会学工作者在现阶段最需要开展的工作。西方社会学界对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是在大量专题调查的基础上积累、提炼而产生。同时，这些基础性调查结果也是我们检验宏观理论是否符合实际的试金石。一个学科只有经过基础性知识的大量积累和不断检验淘汰，才能为理论总结奠定基础。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在任何学科中都只能是少数，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主体始终是从事具体实证研究的人员。

### 三、我国民族社会学专业的发展前景

在我国目前社会学界，包括各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和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中，以民族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业人员数量很少。目前在大学的社会学系长期开设“民族社会学”课程的，大概只有北京大学一家，力量非常薄弱。现在各个综合性大学(民族院校除外)每年招收的学生当中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很低，毕业后仍然愿意从事民族研究的学生就更少了，各校开设课程的情况也反映了这种客观现实。除了本身来自少数民族或曾经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的人之外，人们一般地对民族问题不太关心。所以报考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和愿意从事这个领域教学工作的教师都比较少，这也是80年代以来这个专业方向始终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师资的缺乏也是这个专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于国内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和设置这一专业的大学很少，也就难以培养这个专业的师资。近20年来，我国前往欧美各国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约有几百人，其中选修民族社会学的人数寥寥无几，学成回国从事教学工作的自然更少。由于从国外这个渠道培养我国民族社会学专业师资力量前景不容乐观，在这种局面下，北京大学作为长期开设“民族社会学”课程和设置“民族社会学”硕士和博士专业方向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承

担着为国内其他院校培养师资的责任。现在中国社会学学会下属的“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自1995年以来定期编印《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以促进各地从事民族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在这个方面的工作需要继续坚持。

我国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并且近年来表现出对民族社会学有强烈兴趣的，主要是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综合性大学、民族院校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到50年代以来传统民族问题研究的影响，也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学术传统的影响，其中有些院校正在筹建社会学专业，但是要在这些院校建立和发展社会学这一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从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基本课程的建设起步。但是我们在与这些院校师生的接触过程中，感觉到他们很有兴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和民族关系，也很有趣建立“民族社会学”的专业方向。将来我国“民族社会学”学科研究队伍的建设，很可能主要依靠各少数民族地区（5个自治区和甘、青、川、滇、贵等省）的综合性大学和民族院校的支持。

在这些地方发展民族社会学，具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保护、族群关系是当地的大事，地方政府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妥善处理，设立这一专业和开展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会在各个方面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在这些地区的院校的学生和教师中，不少人关心民族问题的研究并且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经历，所以在这些院校开设民族社会学课程、组织有关研究课题并发展专业学术队伍在人力资源上具有很好的条件；三是这些院校位于少数民族地区，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接触到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到基层开展调查活动也非常便利，这就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和长远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于有了这三个有利条件，今后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和民族院校建立的社会学系专业设置中，民族社会学很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此外，由于汉族学者当中关心民族问题和民族研究的人数比较少，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队伍中，今后可能少数民族学者会占据一个较大的比例。这与国外的情况大致相似，在美国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的，有相当比例是少数民族裔的学者如犹太人、拉丁美洲后裔、黑人、华人等。

在对外交流中，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来中国从事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调查研究的国外学者，大多是汉学家或者是人类学家，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不是国外社会学界的主流，虽然我们从他们那里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民族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他们能够向我国学者提供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在这些方面做出较高学术成就的，是那些主要研究本国民族关系的学者，而他们往往不了解中国，对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缺乏动力。我国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把中国的案例与其他国家的研究文献进行比较，同时把自己较好的研究成果用英文发表，这样就能够使对方感到在交流中有所收获，提高对方与我国学者进行交流的热情，推动与这些国际著名学者的实质性交流。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市场，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种形势下也先后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着自身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不断修订、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不断调整，社会组织的不转型等触及社会深层结构的剧烈变革。在这些变革之中，一个多民族国家内的各个民族之间，由于各自文化传统、发展基础、发展条件的不均衡，肯定会出现文化的再造、心理的困惑以及利益的矛盾与冲突。这就使今天各国的民族关系，与以往历史中在时空上与其他地区、其他社会相对隔绝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很不一样。而且外国的文化影响、经济渗透和政治干预在一些国家内部的民

族关系方面也在发挥重大作用。

我国当前正面临着改革不断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系列涉及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利益分配、人员的流动、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社会变迁，来调查分析这些变迁对各地区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是中国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内容。我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其人口规模、地理分布、宗教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程度也很不相同，他们居住的各个地区在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条件方面也各不相同。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民族的共同繁荣，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状况来设计其发展的道路，而且在出现问题时要及时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社会学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贡献力量。社会学不是“象牙之塔”，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我们的知识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来自于实际调查，也应当运用这些知识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服务。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论文写作的需要，80年代我在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曾选修了 Ethnicity 的课程，并通过这些课程对西方民族社会学文献和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案例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回国后我于198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民族社会学”课程，希望能够通过不断的努力使民族社会学得以在中国社会学的领域内逐步发展为一个新的专业研究方向，这对于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促进我国社会在新的世纪里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在美国和欧洲的民族社会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本国。所以现在西方的民族社会学很少讨论过中国民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甚至也只是很肤浅地论及前苏联及东欧、亚非国家和地区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所以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民族社会学首先可以把西方传统民族社会学所涵盖的地理、社会范围加以扩展。其次可以通过调查实践把几个相关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实现融汇贯通。我们将在研究民族关系时努力把各个学科（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的基本方法都汇集、结合在一起，根据研究专题的具体情况，努力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文献分析等各种方法都加以应用，对一切可用、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做到兼容并蓄。

无论从理论的地域涵盖面上，从理论的伸展上，还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结合上，我们正在进行的“民族社会学”学科建设都有它特有的价值；无论是与国外的民族社会学比较，还是与国内已有的从事民族研究的学科比较，它都有新的特点。这个学科专业方向的发展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有着光明的前景，也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研究人员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中来。

#### 参考书目（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韩锦春、李毅夫编，1985，《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印。

韩明谟，1987，《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戎编，1997，《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杨雅彬，1987，《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ed. 1990, *Teaching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Syllabi an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Seco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ASA Teaching Resources Center.

- Bean, F. and W. Frisbie, eds. 1978. *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nnor, W.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lazer, N and D. P. Moynihan, eds. 1975, *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chter, M.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ex, John and David Mason, eds. 1986,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mpson, C. E. and J. M. Yinger, 1985,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Waters, M.C. 1990, *Ethnic Op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译文选编】

### 《种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前言<sup>1</sup>

T·F·皮特格鲁 (Pettigrew, T.F.) 任道远译

1905年，一群年轻的黑人知识分子在四处活动的杜博依斯 (Dubois) 的领导下会集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虽然已有人为他们订好了一家布法罗旅馆的房间，但他们在到达后，还是因为肤色的缘故而被关在了门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具有斗争精神的年轻人正是为了争取他们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力而到来集会的，但他们却被迫离开了国土跨越国界而去加拿大举行他们的“尼亚加拉会议”。杜博依斯 (Dubois) 在旅馆的被拒绝以及被迫转移后的另一个“尼亚加拉会议”都代表着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渊源，带着这种历史的痕迹，20世纪开始了。同时，这一集会本身——聚集商讨改变种族关系的策略这种行动，也预示着20世纪的这幅历史画卷中将会展示些什么。

我们的故事从世纪之交 (大致从1809年到一战爆发) 开始，正是在这一时期里，现代的种族关系和现代的社会学同时诞生了，二者都在那段貌似平静的岁月里成形，但他们的前途却没有任何保障。黑人、土著、亚裔以及西班牙裔的美国人脱离于社会大众的视线之外，他们的命运处于极度的低谷状态，各自不同的对前途的希望被不断重复的政策变更冲淡了；同时，社会学也远离学术界的视野，在普遍的认识里并不属于学术的殿堂。社会学希望作为一种全新和全面的社会科学被人们接受，但这种希望同样也被一次次的拒绝冲淡了。二者的相似性在个人身份这一点上

---

<sup>1</sup> 本文为 T·F·皮特格鲁主编《种族关系的社会学》(Pettigrew, T.F. ed. *Sociology of Race Relationship*,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一书的“导言”部分，虽然以介绍此书为目的，但包含了社会学研究和种族关系演变这两项宏旨，这也是摘译本文最主要的意义所在，故而在译稿中，译者对其论述这两个主题的部分详加参析力求准确传达，而对一些介绍成书过程及该书体例特征的文字则删繁就简。

则不复存在了——象杜博依斯 (Dubois) 这样的例外情况很少——社会学家大都是白种盎格鲁的男性,他们处在国家统治集团的位置上,过着舒适的生活。虽然如此,二者仍然存在着对彼此间的深刻影响;这本书要讨论的焦点就是这种本质的、作为内因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张力。

## 一、世纪之交的种族关系

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很难正确评价在四分之三个世纪还往前的世纪之初,这个国家的四个基本的少数民族群体所处的那种低微生活状态。南方开始对黑人处私刑是种族压迫最明显的标志,在 19 世纪 90 年代这种状况达到了历史上最猖獗的地步。密西西比州在 1890 年通过了剥夺黑人投票权的正式决定。紧接着,产生了大量投票表决的要求,这些决定的内容包括南方财产的所有权、常规的雇工制度、人头税、对文化程度的模糊测试、“理解 (understanding)”、“良好人格 (good character)”以及臭名昭著的“教父条款”(godfather clause)(这一条款对那些在内战后刚投过票的公民和他们后裔的公民权加以约束)等。1896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Plessy v. Ferguson*<sup>2</sup> 一案的审理中核准了所谓的“分离但平等 (seperate but equal)”的条款,这一条款直到 1954 年做出在学校反隔离的规定时才得以取消。对设想的分离但平等原则的接受诱导南方的白人创建了大量系统化的种族分用的设备,这些设备直到最近才被拆除。在那几年里,种族隔离成了法律支持的“南方的生活方式”,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所有角落。1890 到 1915 年之间,整个黑吉姆 (Jim Crow) 法令被真正实施了起来——分离的火车箱座位,分用的午餐柜台,分开走的门廊以及隔离起来的候车室。没有什么细节是琐碎得过头的,在奥克拉荷马甚至要求有分用的电话亭,许多法庭开始让不同肤色的证人用不同的圣经来立誓。

印第安土著居民过得也不好,和南方滥用私刑的暴力行为相比,他们的这个时期开始于松树山脊 (Pine Ridge) 地区对苏族的大屠杀。1890 年 12 月印第安人的代理人在一个大型的复古 (tradition-reviving) 鬼舞节 (Ghost Dance) 庆典上请来了士兵,由于误解了印第安人的行动,这支军队杀了参加庆典的所有男女老少共 300 人,让他们暴尸于南达科塔的 Wounded Knee,冻了三天。这个时代同时也是伴随着 1887 年的土地分配法案 (General Allotment Act)(或曰 Dawes 法案)的篇章片段开始的,这个法案类似于南方针对黑人采取的剥夺公民权以及种族隔离的立法活动。从结果上来看,这一法律完成了对印第安人土地的长期征用。法案为每个印第安人的家庭提供了 160 英亩的土地,并将征用土地称为:二十五年来土著出自信任,将那些被分配的土地保持在政府手中,此时又将他们多余的土地卖给政府。这一法案侵扰了多数印地安部落关于土地共有的观念,没有为他们的后代在未来保留任何土地,最终使得印第安人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里,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一亿三千五百万英亩土地中的九千万英亩。

印第安人所保留下来的权力少得可怜,就连“五个文明部落”(包括希腊族 *Greeks*, 查拉几族 *Cherokees*, 巢克图族印第安人 *Choctaws*, 契卡索人 *Chickasaws*, 撒未诺人 *Seminoles*) 的基本的自决自治权力也被取消了。当时一种政策被推及所有的印第安部落时,根本不考虑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别。美国最高法庭不断核准国会“取消某个印第安协议之规定”的权力,在 *Lone Wolf v. Hitchcock* 法令中(1902 年)断称印第安人“生活在政府有力保护所创造的结果中”。Edward Spicer

<sup>2</sup> *Plessy* 和 *Ferguson* 分别是本案法官和当事人的名字 (译者注)

这样写道：“美国现在所处的状态是不会有错的，它现在已开始了一项迫使印第安人进入文明模式的计划，这一模式必将成为今后美国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体系。”

与此相同的“时代的精神”同样也影响着亚裔的美国人。在19世纪晚期，针对华工的群体暴力事件举目皆是，特别是在采矿区。当时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已经完工，同时将华人视为“黄祸”的比喻也日渐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禁止华人入境的立法行动于是就开始了。第一部排华法案于1882年通过，1892年续订，在1904年成为永久性法案。在世纪之交华裔工人主要靠为城市居民提供家政服务谋生，而很难在矿区或铁路线上发现他们的身影了。也是直到那些年，随着次经济体系的繁荣，在商业贸易和服务中，少数民族场常居于中间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这种地位的行动在市场中逐渐成为了某些制度化的运作方式。

日本人大量地向大陆移民在中国人之后，也是在他们早先向夏威夷的移民之后。虽然对他们的暴力活动较少，但在本世纪初就有人鼓动约制日本移民进入美国。在1907到1908年间，日美两国签定了“君子协议”，协议要求日本只给那些曾为美国本土居民者或父母妻子以及孩子是美国居民者发放护照。虽然这一协议常常被变相地规避开，但仍然降低了日本移民的速度，而1924年的移民法案则以雷厉风行的规定完全停止了这样的移民。美日关系发展的这些关键的年份离不开一种对低收入工种的认可和需求；但是这些移民们对拥有土地和创业有独特的价值追求，这很快就促成了他们在土地买卖和在城市零售业以及个体服务中进入了中间人的角色。

虽然华裔和日裔是美国社会中最大的亚洲人集团，但他们加起来只构成了亚洲向美移民人口的一半（亚裔移民人口数在1970年大约是210万）。菲律宾人、夏威夷人、韩国人以及最近多起来的越南人都拥有相当规模的社群。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学研究往往专注于美国黑人，对亚裔的两支数量较大的移民只有简单的观察，而在事实上忽略了其他小的亚裔群体。在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粗略观察的例子。在选文第15篇里，Emory Bogardus提出了一个七阶段的“种族关系循环”理论，强调了美国对待华裔、日裔、菲律宾人以及墨西哥移民的相同之处。在选文16中，Richard La Pierre论证了30年代全国上下建立汽车旅馆的行动过程中，对于接纳中国客人时正反并存的复杂感情。最后，Leonard Bloom在选文第22篇中描述了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强制拘留的政策对日裔的根本性影响。

虽然西班牙裔组成了美国社会的第二大少数民族群体，但他们同样被忽视着。墨西哥人远不如西班牙裔人多，1977年为650万人，而当时的西班牙裔有1130万人。本土波多黎各人是第三大的民族。在学术上这些民族并不是以他们所处的种族关系分类的，更进一步说，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主要是文化上的。然而他们之所以在本书中被加以论述，还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的遭遇及历史很清晰的包含了各个有特色的方面，同时也和这个国家的少数种族劣势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其中的一些相似之处，Bogardus早在1931年就强调过，在第15篇选文里，重新印刷了出来。

1890-1915这个历史时代在美国历史上对西班牙裔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1898年，西班牙在四个月的西美之战后，在巴黎协议中将关岛、菲律宾以及波多黎各转让给了美国，其时美国正开始进入其短暂而可耻的帝国主义阶段。事实上，美国这个世纪之交的时期影响了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一整套看法，这些看法包括强国支配别国的权力以及强国处理本国少数民族的政策。波多黎各人就是以被殖民者的身分进入美国社会的。直到1917年的琼斯法案（Jones Act, 1917）公布后才得到公民权利，波多黎各直到1948年才实现了其独立国家的地位，而大量波多黎各人涌入也

是在二战时才开始的。

象 Joan Moore 在第 33 篇选文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殖民化的模式同样适用于墨西哥裔的美国人。有一支重要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它们是征服土著后成为美国人的西班牙裔的后代。1878 年墨西哥在和美国的战争之后,签定了 Guadalupe Hidalgo 协议,将德克萨斯合并给了美国,并放弃了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纳的大部分地方。这一协议在一年后赋予了那些仍在被占领土上居住的西班牙裔人以美国公民权。但是现代的墨西哥——盎格鲁关系也深受世纪之交那个决定命运的时代的影 响。首先,1948 年后重复出现的“边界骚乱”在这一时期更为频繁和严重,1916 年 John Pershing 将军所率的美国军队追赶 Pancho Villa 的奇袭队而不幸进入墨西哥本土,使得边界骚乱达到高潮。

第二,在 19 世纪将尽的时期里,盎格鲁人向西南及加利福尼亚的移民数量甚巨,以致到了 1900 年,除了直到 1950 年仍然是墨西哥裔占多数的新墨西哥州,他们几乎成了所有各州的多数人口。第三,与同时期征用印第安人的土地不同,对墨西哥人土地的征用几乎完全是在这几年完成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1909 年爆发了墨西哥革命,无数的墨西哥人结束了以工偿债的奴隶生活而必须去寻找工作。同时美国边境地区的农业发展正旺,需要大量的劳力,由此而触发了大量墨西哥移民向美国西南的涌入。墨西哥移民的数量在 1920 年代达到了 50 多万。在大萧条时期及 40 年代出现滑落,在 50 年代早期又再增长,从此后每年的移民数平均约四万。这些数据表明一个显在的事实——当美国的劳力不足时墨西哥移民是被鼓励的,而当劳力有余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就受到阻滞。可以说这种发生在一战前期的 20 世纪移民模式在造就着自身,美国少数民族的关系在那一时期好象是命中注定的。

表 1 将这一时期的黑白种族关系放在了历史的序列中。这张表格引自 Tunner 和 Singleton 兴味盎然的分析,勾画出了各个时期美国的主要种族结构,将每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和“进步”的白人理念同时也被列出,这些“进步”的信仰或则支持着时兴的认识,或则对此进行了挑战。1895-1905 那个低潮的时期亦将被提到,这一时期的种族关系从几个世纪以来被奴隶制严重扭曲的传统中演进而来。除了受当时遍及全球的西方霸权殖民统治的合理化影响之外,这个时期也是对内战后各州重组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在美国种族关系上的抵抗和退却才被称做是“第二次后重组”(the Second post-Reconstruction),这是对 60 年代人权运动的一种反应。

表 1 同时也向我们描绘了从一战发展至今的种族结构和种族理念。只是到了这几年我们才能够对这些书卷给予关注,透过社会学家们提供的分析我们得以与他们共同思考。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了解到本世纪中社会学和种族关系如何经历了质的变化。

表 1 美国历史上种族统治结构和种族信仰概观

| 时期                       | 统治结构                        | 主流的信念   | “进步”的信念  |
|--------------------------|-----------------------------|---|--|
| 英国政权遗留时期<br>(——1650 年)   | 1. 殖民扩张<br>2. 契约奴隶制         | 1. 黑人是没有西方化的异教徒<br>2. 黑人是对神的邪恶诅咒<br>3. 黑人天性野蛮 |  |
| 美洲殖民地时期<br>(1650—1760 年) | 1. 奴隶贸易<br>2. 奴隶制合法化、制度化    | 1. 黑人的兽性特别是在性方面的<br>野性一定要加以控制                 |  |
| 革命时期<br>(1760—1820 年)    | 1. 奴隶贸易被废止<br>2. 南方奴隶制受到了限制 | 1. 奴隶制是必要的罪恶<br>2. 黑人不适合或未有充分准备去<br>享受自由      | 1. 从革命性的价值观看来奴隶制并不稳定<br>2. 虽然在文化上黑人被压制和贬低了,但他们有改进的 |



|                                 |   |   |   |
|---------------------------------|---|---|---|
| Anti-Bellum 时期<br>(1820—1860 年)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面对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及南北经济、政治的竞争奴隶制进一步制度化了</li> <li>2. Northern Jim Crow 法令的推行</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奴隶制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它同时保护了主人和黑人奴隶的合理兴趣</li> <li>2. 奴隶制合理利用了黑人凶暴的天性，并使他们文明了起来。</li> <li>3. 黑人象孩子一样要依赖于白人的保护</li> <li>4. 北部人们仍然保持黑人无知、懒惰而且邪恶的成见</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种族关系是现实存在的</li> <li>2. 黑人如孩童般的朴实和基督教中的真理正好相合</li> <li>3. 奴隶制在道德上使人类谦逊的天性堕落了，同时又享受了这种天性带来的好处</li> </ol>                        |
| 内战和诸州合并<br>(1861—1877)          |   |   |   |
| 一战前的“后诸州合并时期”<br>(1877—1914)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激进的各州合并计划被取消</li> <li>2. 在许多存在规范的领域里种族歧视被政策化了</li> <li>3. 在农村或工厂的工作中黑人被贬为奴隶</li> <li>4. 白人通过暴力手段实施种族歧视和等级划分的政策</li> <li>5. 在法律上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黑人使得各州合并失败，这证明了他们的劣等</li> <li>2. 黑人失去了享受“平等”的大好时机，依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必须自己去寻找他们的社会地位了</li> <li>3. 没有奴隶制的监督和管理，黑人常常会堕落到他们懒惰、易于犯罪和对白中妇女不怀好意的原始状态中</li> <li>4. 黑人不同或地于白人的那些特点要求有种族隔离</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黑人劣于白人，因为他们在进化的程度上不象白人那么高</li> <li>2. 黑人是潜在的有用公民，他们温顺和善良的天性可以通过白人的指导、教育和工业培训来加以引导</li> <li>3. 种族的单一性及种族偏见的特性需要种族隔离</li> </ol> |
| 一战到二战之间<br>(1914—1941)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南方黑人向北移动，限于贫民区和聚居区</li> <li>2. 隔离政策和对黑人投票权的剥夺经由暴力、法律和政策实施又重新开始</li> <li>3. 联邦对低层职业者采取了限制和排斥的政策</li> <li>4. 不利于就业者的就业政策</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黑人的劣等已经是一种科学的事实，进化论和智力测试都证明了这一点</li> <li>2. 隔离主义者的教条仍占主流：种族隔离是必要的，是为了两个种族都好，也使他们所共同希望的</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所有表面的文化、智力的差异都来自于不同种族生存环境的差异</li> <li>2. 黑人是因为没有权利而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受挫、对生活不满的一群</li> </ol>   |
| 二战时期 (1941—1948 年)              |   |   |   |
| 二次诸州合并时期<br>(1948—1968 年)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在不改变基本制度及社区组织模式的前提下，有一些为黑人争取机会的努力</li> <li>2. 用福利制度保证国内的安定</li> <li>3. 经济上和组织上对一体化政策的反对</li> <li>4. 政府零星地采取了一些削减种族隔离的政策</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对法定隔离制度产生了排斥感</li> <li>2. 黑人已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待遇</li> <li>3. 黑人并非天生劣等，能够发生改变</li> <li>4. 对非正规学校及正规教育的提供及对黑人聚居区的修整引起了种族关系的一些可喜变化</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黑人表面上的劣等反映了文化剥夺和不良环境的影响</li> <li>2. 社会一体化是种族关系和谐的唯一途径</li> <li>3. 对学校采取的强制一体化是所有举措中最为根本性的</li> </ol>                          |
| 1968 年至今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事实上居住上的种族隔离仍在继续</li> <li>2. 白人的暴力以及对教育上种族一体化的反对</li> <li>3. 政治和法律上实施“人权法案”的努力在减少</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黑人的地下地位是由自己的缺点造成的，特别是缺乏提高自身地位的动力这一点</li> <li>2. 种族关系的发展速度太快了</li> <li>反隔离和强制的种族一体化太多，超出了合适的限度</li> </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种族优越感”这种东西和美国的美国的社会是一致的</li> <li>2. “同等机遇”的原则失败了，应纠正过去再者方面的错误做法</li> <li>3. 立竿见影的一体化是不可能的，由社区控制的群体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更为实际</li> </ol>   |

## 二、世纪之交的社会学

现代的美国社会学也是在这重要的时间段里出现的。Rober Nisbett 曾指出 1830-1900 年是欧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他着重强调了在欧洲与消逝的 Gemeinschaft 秩序及正在浮现的 Gesellschaft 秩序对抗的时期里所涌现的诸如托克威尔、孔德、Lr Play、马克思和之后的 Tonnies、涂尔干、韦伯及 Simmel 等人的根本性贡献。美国社会学出现在其后的 19 世纪末，从欧洲的传统中借鉴良多，但却在完全不同的土壤里种植了这一学科的种子。在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历史作为模板，而极度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错位，社会学登陆到这个新世界的海岸之初，就对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做出道德和知识上的回应。这塑造着美国的社会学，在这些问题之中，对种族和文化的关注尤为突出。

耶鲁大学的 William Graham Sumner 于 1875 年开设了美国的第一个社会学课程。但是直到 1890 年第二个社会学课才由 Albion Small 在缅因的 Colby 大学开设。虽然今天我们高度评价作为理论家的 Sumner，但却是 Small 精力充足一意向前，领导了世纪之交作为一门新学科的社会学向制度化发展。他 1892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并接受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的职位，其后他建立了全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直到 1925 年退休时他一直是该系积极进取的主任。他与乔治文森特一起撰写了第一本学科内的教材并在 1894 年出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创建了学科的第一份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并在后来的三十六年里担当了严谨治学的主编。1905 年和其他社会学家创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因为大家都不满于社会学在现有社会科学联盟中的低下地位。Small 在 1912 到 1913 年担任了该协会的主席，并孜孜不倦地编辑和出版了学会会议的年度议程。他还是 1922 年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象 Simner、Franklin、Giddings、Lester Ward、Charles Cooley、Edward Ross 等早期社会学名家可能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做了更多的理论贡献，但 Small 无疑是社会学作为专业走向制度化的第一功臣，而且他的个人努力树立了美国社会学最初的动力指向和发展方向。

从开始阶段美国社会学就表现出了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那种独特的进退两难的状况。一方面，社会学必须对批判现实社会的职责义无反顾，对处于其时其地的传统智慧进行充满质疑的判断，并去“解读”那些通行的神话。然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需求的社会学也是其所处社会的一部分，依赖于社会的接纳和支持。这种批判和支持，脱身社会之外和投身社会之中之间的张力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利弊均存。这可以成为社会学想象的创造性动力。但也会导致一种脱离现实，伪装中立的取向。换句话说，就是完全从批判的角色里退却，甚至有时还去全无批判眼光的迎合社会中最显而易见的、通行的偏见和谬见。在这本书中我们将同时回顾这两种趋势。

在 Albion Small 不同凡响的治学生涯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社会学作为批判者和支持者这两种角色间的张力。就象 Ernest Becker 在他的《人类丢失的科学》(*The Lost Science of Man*) 一书中带着同情而描述的那样，Small 对人类的科学性有着不凡的洞察力，但在追求社会学在学术殿堂里被认可的过程里，这种洞察力被削弱了。跟许多这个国家的早期社会学家一样（Giddings 和 Thomas 是部长的儿子，而 Sumner 和 Vincent 则本人就曾为部长），Small 的父亲是一个身为新教徒的部长，Small 曾经在学校里学习了三年技术。他希望社会学能为“社会问题”提供答案，通过改革来弥补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提出对当下社会所存问题的批评。他自己对社会学这一领域的兴趣、他对事所应当的希望以及他在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最初几年里的不停呼吁，

统统都指向作为政策指导和实用科学的社会学。

但 Small 也在寻找另一个目标——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建立，虽然我们已一再提起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巨大成就，虽然他本人也为此极大牺牲了自己最初的学术目标，然而正象 Becker 的深刻言说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这个星球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社会——在改变社会中那些目标一定的机构的过程中，仍然能够积极的运用社会科学。”Small 不得不常常让步于那种取得其他学科认可的需要，诸如政治学、历史学等早已存在的学科，特别是经济学，使得社会学不得不在许多高校中强调自身与这些学科的不同之处。一种严谨而科学的学科形象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才能实现，而这种形象要求不能为那些强调以现存社会的各种问题为中心而指导政策的理论视角留下过多空间。在 Small 去世后的 1929 年，Ogburn 在他著名的在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的主席致词中有一番更为激进和实证主义的直率陈词：“社会学作为一种科学，不着意于使世界变得更适于人们生活其中，不在于鼓励某种信念、播报新闻、树立生活的形象、领导民意又或引导国家的航船，科学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即智慧，发现新知。”

即使我们对 Becker 下面这种颇为绝决的说法难以苟同：“社会学已经退化成为……毫无批判意识、一味矫揉造作地为时兴的意识形态服务的科学技术工具，只强调和关注足量的工作职位、市场需求社会活动及各种运动”，但仍然可以同意他以下这种满含遗憾之情的说法：“社会科学一向难以坦然面对自身形象即为社会批判的这种现实”。的确，获得一种观察人类处境时视野更为宽广的社会科学联合，除了偶然的一些在扩展知识运用方面的努力之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遥不可及。就像机构出版物的脚注上所反映出来的倾向那样，追求从专业角度上得到对所作工作的许可和承认占据了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全部精力。然而上述的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处境。Small 的洞察力不会因为 Ogburn 的那种说法而有所下降。当价值上的追求和严密性的要求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时，社会科学的创造潜力可以实现最大化。这种动态的平衡因时因地而异，而且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封闭的，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作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学：没有方法而只求批判不能为学科提供自己独有的地位角色；而缺乏批判目标的方法则会蜕变成 Becker 所担心的那种“为时兴意识形态服务的科学技术工具”。

社会学既追求批判性又需要为社会提供支持的两难境地，使得这一必然要对其所存社会提出挑战的学科在本世纪的发展中保持了一种本质性的张力。社会学对美国社会可谓至关重要——事实上对任何社会都一样。象 Ogburn 强调的那种经验主义的实证社会学也能以 Small 所期望的那种方式得到运用。举例来说，作为 Ogburn 的学生，Samuel Stouffer 是社会学界最伟大的实证主义学者之一，他终其一生将自己在调查测量方面的天赋运用到对美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从美国大萧条到二战中美国部队的士气及战略变化，从麦卡希主义到世界人口问题，他的研究涉猎很多现实问题。本书的部分选文也提供了社会学这两取向相结合的更多例子。确切的说，社会学并未达到 Small 和 Becker 理想中的那种境界，但也决非只是一个最高权力的毫无批判性的奴仆。

### 三、价值观与种族关系的研究

那种富于创造性的潜力以及与此相伴的寻求平衡的失败之处，都来自社会学的两难境地，这两点在种族关系这个具有震撼力的话题中显露无遗。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具批判性和持久性的社会问题之一，在种族关系的争论中既有社会学对社会严加批判的一面，也有社会力量对这些批判强

烈抵制的一面。由此，我们就不必惊讶于本书重印的 45 篇文章里清晰可见的这种情形：在回应 20 世纪种族关系铺展开来的种种事实时，社会学的这种张力在一直起着作用。

黑人社会学者更多地分享了 Small 的学术视角。Morris Janowitz 曾写道：“在整个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中，他们（黑人社会学家们）深入学科的内核去看种族问题，深入到了重新定义种族关系的充满智慧的工具以及社会变化的诸多实证性因素之中。”在此我要说这一评述对本文所列的黑人社会学者的文章来说，可谓一语中的。

对 Small 的处境代言之人中还有 Ganmar Myrdal, 他的大作《一种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 写于 1944 年，对这个国家如何理解种族关系给出了来自社会学的贡献，并堪称经典的里程碑。我们应该将这一重要的贡献和 Frazier 积极的带有更多保护和防卫性的文章比较着来看。同时还要强调瑞典社会经济学家 Myrdal 更早的发展了社会学批判性的一面，正是他坚持应有对于研究者价值立场的明确揭示。美国社会学的创建者们来自乡村小镇，往往有着新教徒执政时的社会背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利，他们用自己全新的科学去纠正这个国家中出现的社会痼疾。他们对社会事实和个人的价值立场不做区分，事实上，他们寄希望于新的价值在社会学发现自然法则的过程里能够生成。实证主义者曾提出要分开事实和价值观念，而且他们已将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对真正科学的障碍，没有它也无碍于大计。三分之一世纪后，Myrdal 提出了以下的主张：一种明确的价值观念前提对社会学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先在的价值让我们无法进入其他的视角，但它往往能我们将引入新的视界。但它也常常难以避免不够谦逊和思维上的狭窄。Myrdal 用它富有个人特色的笔调写道：“一种‘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废话，从未出现过也永难出现。我们难以放弃价值立场，只有面对它而不是逃避它，我们才能严谨而理智的思考。”

Myrdal 所钟情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念、以问题为中心而较少激进经验主义味道的方向出现时很艰难，但终于在 1940 年代进入了社会学家们的视线。而战时的实用性研究与战后大队年轻的社会学家结成了新的力量组合，终于逐渐导致了社会学学科内部多领域的合并。在这一趋势中，康奈尔的 Robbin Williams 颇值关注，他是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弄潮儿，也在社会学的诸多分支领域研究中有杰出的贡献，其中包括对种族关系的研究。他强调社会学应在使美国社会中不易为人所重视的社会关系更为人所感受以及解释社会中过分简化的信仰这两方面做出贡献。这里被强调的社会关系及简单化了的社会信念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着。对于社会学来说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就是在不同的历史事件点上强调社会事实的不同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学要以理智过人的分析限制社会流行思想的过分膨胀，从而达到其批判性的功用。社会学唯有如是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运用——即和时尚斗争、挑战主流的意识形态，并用自己理论化和经验主义的工具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我想 Albion Small 和 Gumar Myrdal 对这样的说法也会点头称是。如果从时代更替的角度看美国社会学界多年来对于种族关系的各种分析，即能发现这样的标准下，社会学更多地发挥了其揭示真相的一面，较之批判现实更胜一筹。

本书所选的社会学著述讨论的是种族关系，既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状况也反映了欲要改革社会的种种尝试。社会学这一学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这种既要支持社会支持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两难境地的。我们应该回顾那些在各个时期里改革和思考的例子，因而本书收录的文章对那些强调社会学批判性的文章具有倾向性，这种选择有三个理由。第一，批判性的研究往往对之后的相类研究更具影响力；第二，我们要向那些心存疑虑者证明，具有反现实性和力求改革的文章

塑造了过去八十年里社会学的主要特质；最后，批判性的文章能够更为清晰的揭示出各个年代的真实情况，因而也能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向读者提供一种 20 世纪种族现象之历史序列的目标。

#### 四、研究种族关系的社会学期刊文章的特点

表 2 展示了对各种期刊和报章中论及黑人、土著、亚裔、西班牙裔的社会学文章的计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本书重印的文章里从各个时期不同期刊中摘用的篇数。数字表明本书所选文章中对较早的旧类期刊的文章有一种必然性的偏好，因为和近年来的文章相比，他们对种族关系的关注有着更为丰富的视角。

##### 1. 对于种族关系的各种关注

表 2 的数字表明，本世纪上半叶关于种族关系的文章增长迅速，从 1885—1915 年的仅 23 篇到 1941—1950 年的 174 篇。这些增长也准确地反映了这些年来社会学出版物在知识界的普遍增长。从表中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 1922 年开办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 1936 年开办的《美国社会学观察》(*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和 1954 年开办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是这种增长的最直接原因。

50 年代出现了与这种增长趋势不相同的例外，这三类新建期刊的发行量首次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不同的趋势和《社会问题》杂志的开办有关，此刊物是在社会学家对学科关注点存有不满之时出现的，他们觉得社会学未能关注足够宽阔的社会焦点问题，而种族关系只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虽然如此，社会学对种族关系关注程度的下降也还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Richard Simpson 的研究发现 1955-1959 年期间，关于种族关系的著作中，不仅是期刊上的文章数量下降了，甚至美国社会学联合会学术会议的传阅材料也少了此方面的论述，而且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列表中列出种族关系为一特定研究方向的人也越来越少。有趣的是，他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例外——在高校中开设种族关系这一课程的情况却在增加。

表 2. 不同时期美国社会学 4 份主要期刊所载的种族关系著作的情况

|   | 1895-1915     | 1916-1929     | 1930-1940      | 1941-1950      | 1951-1960      | 1961-1970      | 1971-1980      | 总数           | 比例               |
|---|---------------|---------------|----------------|----------------|----------------|----------------|----------------|--------------|------------------|
| 美国社会学期刊<br>( <i>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i> )1895 | 23<br>(5)     | 22<br>(1)     | 50<br>(2)      | 44<br>(2)      | 40<br>(2)      | 49<br>(2)      | 54<br>(1)      | 282<br>(15)  | 26.8<br>(33.3)   |
| 社会力量<br>( <i>Social Force</i> )1922                     | —             | 50<br>(5)     | 62<br>(4)      | 80<br>(2)      | 65<br>(4)      | 97<br>(2)      | 59<br>(3)      | 413<br>(20)  | 39.2<br>(44.4)   |
| 美国社会学回顾<br>( <i>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i> )1936  | —             | —             | 11<br>(0)      | 50<br>(2)      | 47<br>(0)      | 33<br>(0)      | 58<br>(3)      | 199<br>(50)  | 18.9<br>(11.1)   |
| 社会问题<br>( <i>Social Problems</i> ) 1954                 | —             | —             | —              | —              | 34<br>(2)      | 62<br>(3)      | 63<br>(0)      | 159<br>(5)   | 15.1<br>(11.1)   |
| 总数量   | 23<br>(5)     | 72<br>(6)     | 123<br>(6)     | 174<br>(6)     | 186<br>(8)     | 241<br>(7)     | 234<br>(7)     | 1053<br>(45) |                  |
| 百分比 (%)   | 2.2<br>(11.1) | 6.8<br>(13.3) | 11.7<br>(13.3) | 16.5<br>(13.3) | 17.7<br>(17.8) | 22.9<br>(15.6) | 22.2<br>(15.6) |              | 100.0<br>(100.0) |

这种现象有些奇怪，因为当时发生了在法律上对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否定，最高法院宣布这种做法有违公平的原则又破坏了人生来平等的信念，正是这些年里的这些事件为以后 60 年代人权运动的理想和希望播下了种子。一些观察家引 50 年代社会学界对种族关系问题的淡漠为由，认为这是社会学家未能更好预见运动和反抗即将来临的原因。不管这种关注程度下降的原因是如此的复杂，有两点是肯定的，值得在此提出：其一，当社会学要发展其独有特性时，所获资源甚少，私人基金和政府都拒绝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支持。本书的编辑是 50 年代的社会学研究生，他清楚记得当年受到的如此教诲：不要将研究限于种族关系的领域，因为没有足够的职位和资金支持将后的生活。其二，也是更为抽象的一个原因，50 年代在社会学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认识，旧的诸如帕克（Park）的种族循环、阶层、分层等理论已经显得贫乏，而在种族关系领域关于歧视态度及以及权威化人格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也太过简单，急需一种抛开心理学因素而强调权力和冲突的新结构模型。在第 5、6 两节中我们会看到这种理论萌芽所产生的结果。现在看来可以如此解释，这种对主流种族关系理论的不满也造成了对种族关系关注程度的下降。

很难说，在 60 年代那个变化至反抗和产生骚动的阶段里，社会学对种族关系关注程度的增长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地方。但是 70 年代这种趋势的不断扩展就显得难以解释，就好象 50 年代形势大好人们却不关心种族关系一样，70 年代政府银根紧缩，人们的注意力本该都集中在其上。70 年代的一些早期作品中表现出了对 60 年代研究的延续，但这很难说成是一种解释，因为 60 年代公众对种族关系的热情在 70 年代一直得以保持。社会学是否在这些年里如 Small 和 Williams 所愿担当了发现、揭秘的角色，在本书的第 7 部分里我们将更贴近的观察这种现象。

## 2. 对美国黑人的关注

关注黑人而相对忽略土著、亚裔、西班牙裔也是研究种族关系的著作里较为显著的一个特点。Lavender 和 Forsyth 回顾了 1900—1974 年的《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和《美国社会学回顾》（*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把指向不同少数民族的文章按类划分，结果发现有 71% 的文章是有关黑人的，相比之下，只有 5% 是关于土著的，7% 关于亚裔美国人，4% 关于西班牙裔美国人，另有 13% 的文章是关于其他白种少数民族团体的。

现在的观察仍然能发现同样的情况，在表 2 列出的 1053 篇文章中，关于黑人以及黑白种族关系的文章有 75%，而关于土著的文章只有 4%，关于亚裔的 6%，关于西班牙裔的 4%，关于其他群体的有 3%，种族关系总论性质的文章约有 8%。本书所选的文章也反映出了种族关系研究的这种特点，71% 的选文是关于黑人和黑白种族关系的，9% 的文章是关于其他种族关系群体的，而种族关系总论性质的文章有 19%。

## 3. 研究者的背景

黑白种族关系与美国历史特别是南方的发展史混合在一起，因而对《社会力量》（*Social Force*）这份立足于北卡罗来那大学并与南方社会学协会长期保持学术联系的期刊来说，其刊发大量关于黑人的研究文章就不足为奇了。表 2 表明在四份主要的期刊里有五分之二关于种族关系的文章是由这一刊物发行的。黑人学者的著作在本刊中尤受重视，本书的 12 篇此类文章中有 8 篇就是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上首发的。

这些数据表明南方的社会学家中，黑人和白人学者对于种族关系研究所做的贡献有所不同。Gaston 和 Sherohman 对 1895—1970 年间的著作所做的研究证明，在这四本期刊中确实存在此种现象。他们发现对于生在南方的白人社会学家来说，地域特征在促使他们对种族关系发生研究偏向时起到了更多作用，而在南方大学获得第一个学位及与南方的学术机构有某种工作关系也对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向有所影响，但在南方大学获得最高学位的情况对选择种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却是某种障碍。写作种族关系学术文章的黑人学者则全部具有以下特点：(1) 生在南方；(2) 首先在南方获得大学学位；(3) 在南方拿到了个人的最高学位；(4) 其课题挂靠于南方的研究机构；(5) 所发表的著作大都是以黑种美国人为主题的。在他们所研究的这些期刊中，Gaston 和 Sherohman 发现南方学者发表的文章虽然只占 1/5，但在这些文章中却有 2/5 是关于黑种美国人的。这样的结论也适于本书中的文章，在我们所选的作品中有 42% 来自南方的黑人或白人社会学家。

南方学者的这种写作数量上的优势有助于解释种族关系研究领域里的一些其他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不管是这一领域中以自由主义的政治论调和假象为主流的现实情况，还是近年来这种现实受到的来自左派或右派的挑战，都至少部分地和南方学者们的研究偏向有关。在南方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立场，广泛地存在于黑人和白人的知识精英中，和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其内容强调所处社会的主流倾向，必然性地导致了南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将种族关系作为其理念的关注的焦点。虽然非南方的学者们对此种价值观念几乎毫无了解，但在本书中仍能看出这种不断发展的价值观念对许多著作影响深远。所有的社会科学著作，只要是关注着一个引起极大争论并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主题，往往都或显或隐地发端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很明显的，对于这些著作的自由主义基础所做的批评，因为其质疑的是一种影响如此深远的意识形态的智识，自然会形成某些有效的观点。

#### 4. 三个基本的主题

对南方学者这种浓墨重彩的描述，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关于种族关系的作品往往关注的是以下三个在南方有着特殊力量的主题，Vander Zanden 将这三个主题总结为：(1) 对于黑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利处境的描述和统计，(2) 对于那些认为黑人在生理上即为劣等的种族主义进行抨击，(3) 对由白人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而造成的黑人恶劣社会地位的解释。

#### 5. 三种分析上的偏向

对以上三个主题的关注也导致了现今受到严厉批评的三种种族关系研究中的倾向。在描述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劣势时，社会学著作偏爱静态的描写，静态描写远远多于对动态过程的叙述；对黑人生活消极被动和病态角度上的描写远远多于对其积极主动和健康生活方面的描写。而且，在攻击白人种族主义和作为例证的某些白人的错行时，这些著作常常把对个人层次上的诸如具有偏见的个性等现象扩大化，视之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层面的现象和群体性的歧视。

在新近的作品中这样的偏见较之从前逐渐减少了，因为将种族关系看作一种动态过程的研究立场已经普遍化了，但在最初的八十多年里我们所说的这些倾向性占有主流的位置。

在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判断过去的作品时，近来对种族关系著作的批评常常强调那些态度更为积极的研究的重要性，以对以往研究中对消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做出回应。这些批评发生在 60 年代晚期 70 年代早期，和态度激进的黑人对社会学学科提出的挑战相关，这一点我们今后再做

讨论。这样的批评都起到了修正理论的作用，意义非凡。但再引 Williams 的一句话来说“钟摆晃出了界……这些最基本的也是最寻常的解释过分一般化，难以引起理论上的有效攻击和保护。”在强调少数民族积极健康一面的同时，这些批评越来越接近于对种族歧视毁灭人性这一点的否认。很快这些批评激起了应得的反对。正是在这种各极观点的争战中，我们得以保持对一种更加平衡的理论综合的期望。不论如何在我们以编年体例回顾这些论述种族关系的社会学著述时，仍需在心中存有这里所提出的分析偏向性。

## 五、本书的大致内容

第一部分的文章写于 1895-1915 年。其时主要有以下历史事件，1895 年 Small 创立了社会学期刊，而这一时期里南方乡村中黑人的大移民成了美国种族关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第二部分的文章写于 1916-1924 年。这一时期里一战发生，移民数量巨大，通过了一些可以缓和种族关系的法案，堪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但也有些希望重回白人统治时期权力结构的事情发生。

第三部分的文章写于 1930-1940 年，这一时期美国的大萧条笼罩了一切，对种族关系的研究也不免受此影响。

第四部分的文章写于 40 年代，这一时期种族关系变化剧烈，二战对此有着极大的影响。同时在这部分里也选入了一些探讨社会学和种族关系研究之关系的文章，对其后的研究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五部分的文章写于 1951-1960 年，这些年看似平静，实际上既有在学校里实行种族隔离法案的情况，也有对这些种族歧视性法案的激烈反抗。这些文章分析了这些现象，并说明了社会学是如何改造当时的主流种族观念的。

第六部分的文章反映了种族关系研究中理论转向在 60—70 年代的延续。对种族关系的动态、过程性的研究逐渐增加，具有不同取向和关注点的文章丰富了我们关注种族关系和社会学的视线。（参考书目从略）

（译者：任道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999 级硕士研究生）



# 详析差异，寻求和谐：贝利兹内种族、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建构<sup>3</sup>

Laurie Kroshus Medina

高翔 译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国家主义者提出的计划，这些计划与组成一个贝利兹国家(a Belizean nation)的主张相互竞争，这些计划主张多元化的民族主义(pluralist nationalism)，认为国家是由多个民族共同构成；而种族综合主义者试图通过单一国家特征来掩盖民族或种族的差异；种族霸权主义则试图人为地将某一个种族的特性成为国家属性并且排除其他种族特征。在这些计划中，同质化的进程建构了国家的同一性，这又与构成亚国家的差异(subnational difference)的特殊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而正是种族、民族或两者的混合组成了国家的同一性和亚国家的差异。本文探索的是种族、民族和国家特征的基本实质如何促使它们之间彼此相互同化。

**关键词：**国家主义(Nationalism)；种族；民族性；贝利兹；文化

根据官方定义，贝利兹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港口”的多民族国家，它具有文化多样的特殊轮廓和对这种多样性的包容两个特征。贝利兹的在多样性中的联合在政府创作的用于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中的介绍部分被强调为：

贝利兹拥有她自己丰富的文化，包括贝利兹不同民族群体的文化遗产；源于贝利兹民族以及个人创造性努力所留下的精华。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共存于同一社区的文化的自然互动，因殖民政策的区分和规定而被阻止，因之确保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得以广泛的保持独立性，彼此间有显著的不同。并且殖民文化维持其显赫的地位。非殖民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部分必然是抹灭所有殖民所遗留下来的对其他每一种文化的歧视。我们民族的历史起源和近来较多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已产生了多样性。在这多样性之外，当认识到我们不同习俗和传统的价值时，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统一(教育部 1983, Minister of Education)。

在这个多样性的贝利兹国家，种族群体所指的成员包括主要的两大类，克里奥和西班牙，另外还有 Garifuna 和尤卡坦人，Mopan,和 Kekchi。每一类的构成包含 peoplehood, 民族血统 peoplehood 的确认是有争议的，即是在族群边界的定义、同其他族类的关系和有分歧的方法的内容；然而，每一类型目前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被认为拥有独自の文化和独立的世系联系。Crede 这一类黑人特征和混合祖先，其中至少会有非洲人的因素(Judd 1992,p.172)。Garifuna(过去被视为黑色加勒比)包括一个“混合的”特征，归因于在东部加勒比，自由非洲人与土生加勒比社会在生理的和文化的混合。Mopan,Kekchihe 和尤卡坦常唤醒明晰的、以语言为基础的特征，尽管一些 Mopan 和 Kekchi 的领导人一直在为建立一个 overarching 的玛雅人特性奋斗。自我判定为西班牙人的人被官方标定为 Mestizo, Mestizo 是一个西班牙词，指混合的土生美洲的和欧洲的祖先。几种官方估计的规模较少的民族是——印第安人、中国人、叙利亚人、Mennonite 人和白人——是该国核心成员中较少的部份。

然而，官方就贝利兹国家多民族观点(vision)不仅是可行的建构(construction)。1990年我参加过一次在周六下午举行的橄榄球赛；观众间的互动显示出贝利兹一个可选择的构成，是与官方的多民族定义相冲突的，也是对该定义的一个挑战。球赛是贝利兹队对抗从危地马拉来的一个队，危地马拉是贝利兹邻国，声称应拥有贝利兹的主有权并曾威胁入侵。在该国威胁的背景下，

<sup>3</sup> 本文原载于《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0, Number 4 (October, 1997)，第 757-780 页。

这场橄榄球赛成了贝利兹表明其自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机会。球赛在与危地马拉边界相接的贝利兹西部举行，该地区明显的以西班牙人占多数。但是有许多观众从该国的其他地区来该球场观赛。并且和危地马拉一样，观众包括属于贝利兹国各个民族群体的人。尽管危地马拉队控制了比赛，一群站在我附近的西班牙裔贝利兹人仍然每到贝利兹队攻入对方球门时都会热烈欢呼，希望激励自己的这一方。当下半场贝利兹队经过危地马拉一方时，一个可能有些微醉的黑人，停在看台前并转过身对西班牙裔球迷喊到：“老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一个西班牙妇女回敬道：“我和你一样是贝利兹人！我们是在 Banquer，如果你到过 Banquer 你就会发现那儿没有黑人，但那儿仍是贝利兹，并且我们是贝利兹人。” Banquer 是一个靠近与危地马拉接壤的边界的镇，该镇的人口大都被认为并且自认为是西班牙人。她的断言：“那儿没有黑人但仍是贝利兹”表明她理解那个男人的逻辑：黑人能被假定为贝利兹人；其他的不行。尽管他质疑她作为贝利兹人的认知，她通过反驳说西班牙裔同他一样毫无疑问是贝利兹人，挑战他的假定。

这个男人未被那个妇女的话说服，并且因贝利兹队的显然将要面临的失败而脾气暴躁，他回敬道“你们都刚过河！”他的话断言那个女人和他的同伴更应该是危地马拉人而非贝利兹人，他们非法越过边界，因此他们出现在贝利兹是犯法。

更加愤怒的西班牙裔妇女依据民族起源的基础断定她的出现是合法的。声明以 Mastizao 或西班牙为标志的玛雅人祖先，她回答：“我的民族早在白人把你们作为奴隶带到贝利兹之前就已经在贝利兹了！”她的回答颠倒了他们的特性，以她自己为本民族人而对方是外来移民，而且不是自愿的移民，而是以丧失尊严的奴隶身份被带到贝利兹来的。这个男人声称那个妇女是“老外”而非贝利兹人，根据的是她的体质特征；她对于那个男人是贝利兹人和他的祖先是奴隶的假定也是基于他的体质特征。双方都深深的激怒了对对方，通过彼此贴上有失尊严的标签来攻击对方的尊严——“老外”，奴隶。那个男人继续喃喃自语并交替不断的对着站台上的人咆哮那个妇女和她的朋友们是“刚过河的”“老外”。那个妇女最后改为以支持、并为危地马拉队每一次接近贝利兹队的目标来反击。

这个西班牙妇女在断定她自己 and 那个挑衅她的黑人属于贝利兹民族的成员时，同官方的多民族贝利兹定义是一致的。但是，这个黑人男人却用的是另外一种定义，把西班牙裔人作为“老外”而非把他们合并到他们之中作为贝利兹公民。他看作黑人民族的贝利兹，没有把看上去是西班牙裔的人包含进去。这位妇女从对贝利兹民族的忠诚转变为支持危地马拉队的胜利，因而允许她自己通过参与到击败贝利兹队（那个男人的）的那一方，以此报复她被排除出贝利兹民族；这种行为也更进一步证实了那个男人的对于西班牙裔人是否真正的忠诚的假设。

这一冲突中的双方推进了各自相反的民族主义者计划，这些不同的计划按照截然不同的观念，冲突性的组成贝利兹民族。福克斯（Fox）认为民族主义者对“国家应该是怎样和将会怎样的”这一问题，通常表现出多元的、彼此有争议的定义。下文我将按照第三种贝利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检验这两种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这第三种观点提供了不同的、常常是相矛盾的看法，而同时是贝利兹国家组成的基础。我也试图探讨从两种民族主义者的已经超出了国家的所有之外的计划中择其一的影响：这些有争议的计划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法去定义种族和\或民族差异和同一性，正如联结种族或民族独立性为一个民族的不同方法一样。

## 同质化和特殊化的进程：国家和它的组成

### **国家主义者的计划**

一种国家主义者计划定义和限制作为一国内成员的资格，把国家同特定的地域联系起来，并且组织政府在她的成员中进行资源的分配并做出解释。这一目标可能被制度化的政府、尝试夺取或建立政府的运动、或者那些关注政府资源重新分配的群体所执行。把地域同一定的民族血统 *peoplehood* 联系起来，国家主义者通过定义共享的特性来同化差异，该特性标志作为同一种民族的人居住在某一区域。这一同化的进程已经被引起作为对特殊化主义的进程的反对，该特殊化主义化的进程是通过沿着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小地方或大区域这一条线，国家产生或组织亚国家 (*subnational*) 的差异。下文我将检验这个方法，同化和特殊化策略被整个联系到独特的民族主义者的计划，焦点在于种族和民族的特殊化的方面。

Bolland (1987; 1988) 已经区分了三种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这些计划代表不同的立场，这些立场是关于一国内 (霸权性的、综合性的、多元性的) 民族和种族同质性或异质性的。在霸权性民族主义理论里，人口一个首要的元素是 *work to* 使它自己的特征成为唯一的 (*exclusively*) 与这个国家相关联的特性。这个国家因而被定义为种族的或民族的同质性，并且这个成功的将她自己的特性联系到国家中去的种族和 (或) 民族群体，既成为“正常的”也是标准化的 (比较威廉姆斯 Williams 1989; Frankenberg 1994)。把国家同一个特性等同起来而放弃 (*render*) 其他种族的和民族的可辨别的和有疑问的特征；定向于边缘或排外。

综合性民族主义者的计划是通过混合和联结实践与价值观 (与民族文化组成联系而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国家文化和特征)，探索创造一种共享的国家文化。国家的成员继而而被鼓励将他们的民族的从属关系放在一边，而去拥抱新的国家文化和特征 (一切被假定已有了贡献)。综合民族主义因而通过再次确认特征和国家中的实践而非“亚国家的”术语 *terms*，致力于 (*work to*) 磨灭差异和同质化一定地域的人民。

对比之下，多元民族主义“包括 *overarching* 国家的特性的识别，依据公民权定义，按照将各特性协调为几个民族群体之一，这些群体一起被视为组成这个国家 (Bolland 1987, p.12)”。多元民族主义“合法化几个种族和民族群体的共存、持续，和 *hyphenated* 特征 (Bolland 1988, p.205)”。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贝利兹是官方的定义为多民族国家。然而，我们也观察到黑人贝利兹足球队球迷致力于 *working to* 优先选择把他自己的特征与国家在国家主义异质化的模式联系起来，以那位西班牙裔妇女和她的同伴的生理表象而将他们排除在外。除了这些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民族主义者的计划之外，政府它本身推进一个综合性民族主义者的策略作为对应民族多元主义者重点的筹码。关注到贝利兹内的民族多样性的认知是潜在的危险和分裂，政府也 *works to* 致力于通过从不同的“民族文化”到汇集为贝利兹的国家文化和可以排斥民族独特性的国家特征，综合化价值观和实践。

### **同质性和差异的结构**

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计划中的差别，指出国家的共性和亚国家的差异 (*subnational difference*) 中的共同结构：多元民族主义者将种族或民族的多样性融入一个国家；霸权民族主义把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特性与国家联系起来，也边缘化其他民族为“外国人”；综合民族主义试图融合种族和民族的差异到一个国家的 同一 中去。在这些目标中，按照种族或民族、或合并种族和民族两者，

可能组成了国家的同一和亚国家的差异。是什么允许这些类型去相互替代或彼此吸收？

Peoplehood的国家、种族和民族形式，都是人类代理human agency的历史产物，是组织经验的文化类型，是定义关系，定向行为。然而，许多有影响的peoplehood的结构模糊了人类中介（human agency）历史的偶然性、以及包含在他们的行为和再行为内的力量，定义他们自己为“国家的”从属关系建立基础于一个社会和历史之外的“国家”的秩序之上。（Yanagisako 和 Delaney 1995,p.20）。在实在说的假设基础之上，种族已经被很明确的指定为一个“国家”的从属：个人的类别同种族的类别一起被视为共享一种共同的“物质”或“本质”（这就把他们从其他类中去区别出来）。这共享的物质，有时通俗的指“血统”，被理解为由父母传递给孩子的；据信，产生他的形象（由生理外表被识别）的外在表象。（Alexander 1977）。尽管这种一个定义和限制了种族的类别的共享的物质（a “shared substance”）的信念缺乏生物学上的实在性，因为一种文化的结构它具有有力量的社会后果。“共享物质”的呼吁对种族的差异划分界限（demarcating），国家化了那些差异；它把他们放到人类历史和人类中介之外、使他们成为绝对的和不可更换的。

如果种族已经被清楚的建构为一个“国家的”类型，民族的从属关系更加会被归入一份共享的“文化遗产”。然而，有关记述民族世系差异的概念的运用——在介绍中提到，它在贝利兹的实践被反映到有关民族群体特征的基因分析的描述中——把民族性联系到“共享的物质”的转移上。民族的标签的运用和正式文化的概念的技巧，进一步为“文化群体”的国家化和核心化做出贡献。文化这一术语指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已经被人类学家用来简单化和系统化规则和意义（是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时刻改变的（fluid）和面临挑战的）。然而，大众化的观点常常具体化文化、改变一个分析性的抽象为一种坚实的实体，例如捆在一起的几组“礼节和习惯”引用到政府构建的贝利兹的多样性的结构中去。这些因素促使民族性（描绘每种民族类型为转换历史的集合性的特征，这特征占据了它自己的文化）的论述出现（Handler 1991;Segal 和 Handler 1996）。文化差异的论述（差异是证实民族群体和他们的传统）描绘了文化和它的从属特征的轮廓，这一轮廓是“前道德的”和无终止的，在历史和人类的中介 agency 之外的；然而他们让民族特性与同样的实体论者（essentialist）的人类差异（报告了种族的建构）的概念直接面对。Glick Schiller 提到，当“文化的概念被用在国家化和核心化差异的途径上”，“人们可以说文化而继续去想种族”（1995，p.111），当民族差异逐渐被视为自然的和绝对的时候，民族的特征可能种族化：正如生理表征、文化的实践和价值观可能被定义为一种较内部的特质或物质的表达一样。作为一个结果，定义在民族或文化中术语的共性和差异的国家主义会像那些将种族作为他们的参考点的理论一样，可能尽量完整的实体化（essentialize）特征。

种族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特征的实体化(essentialization)有益于提供便利，使国家的、种族的和民族的特征能够互相吸收。接下来在区分一种从属类型与另一种从属类型时的困难已导致争论，这些争论是关于用一个术语去标明有关联的种族-民族群体和国家的形式（Fox 1990,p.3）。从这些类别的特性中识别不可靠性（slipperiness），我将不会区分它们，目的是反映贝利兹的不同的关系（terms）的用法，并且通过在贝利兹互相吸收的类别来探索这一进程。

### **国家财产的具体（物质的、重要的）结果**

当在竞争性（该竞争指：在组成种族的和民族的特征、以及定义它们与国家的关系的互相竞争）的国家主义中的斗争，包括对象征和社会意涵的争议时，他们从物质的关注中表现出来，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后果（material consequences）。既然在国家中主导的，常常是可以翻译为较强烈

的呼声——确定权利和资源控制或由国家来开道路，在一国之内竞争荣誉的一席之地，同时包括整理国家资源的分布的斗争（Williams 1989,p.432;Verdery 1993）。确实，在贝利兹，对贝利兹的特征呼吁被看作正确的译为一些方面的优先权利，这些方面是：得到工作，土地，房屋和政府的项目，以及多种多样的民族主义者计划。这权利反映民族内的对这些资源的争夺。尽管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讨论关于在贝利兹种族和民族差异；以及把他们联系到这个国家的有争议的方法之象征性的章程——这些斗争仍然最终订立目标，就是去影响由国家控制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参见 Medina 1997）。

### 使一定地域住满人（Peopling a territory）

在欧洲殖民者殖民美洲的初期，西班牙声称：包括今天的贝利兹在内的区域为其所属。然而，贝利兹当地的居民成功的抵制了西班牙人殖民和重新安置他们的企图\*。贝利兹长期的殖民始于17世纪，当时是英国的私掠船在海岸沿线建立的一块地域，并且开始时是以非洲奴隶的劳动开展业务的。贝利兹殖民地在明晰的种族关系中（terms），产生了绝对的差异和等级制（便利了殖民的目标）。在17和18世纪，官方的人口调查从奴隶中区分了自由人、及从以下人中抽出了肤色上的区别：白人，有色人种，和自由黑人。白人和黑人的类别被定义为“纯种族的”；他们的“混血”产生“有色的”人们，这些人是累积了财富和奴隶但是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人。重要程度的变化与“国家的”特征相符合。早期，在西部印第安出生的奴隶，因为被贴上“克里奥”的标签，被从那些出生在非洲的奴隶中区分了出来。“克里奥”是一个从西班牙术语“criollo”中衍生而来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的”地位，“criollo”这个词后来被挪来作为一种有色和自由黑人成员类型的自我认知：因为他们为他们自己争取一个更重要的政治上的角色，他们争论到，作为这块殖民地的“本地人”，他们当然应得到能够维护好他们的利益的信任（Judd 1989 ,p.112）。整个奴隶时代，少数白人成员定义他们自己为英国的国民和频繁的寻求英国军队帮助他们对付奴隶的反叛、“掠夺”“印地安人”，以及再现西班牙式的迫使他们（被殖民者）迁移的攻击。

19世纪被标志为解放奴隶和移入移民的时代。加勒比人，以他们在 St.Vincent 强烈的反对英国的蚕食而著名，开始到达贝利兹率先解放奴隶。加勒比已经把非洲人融合到他们的社会中去。并且，随着他们的失败，英国将他们分成了两个“有色的”类型，将肤色为较浅的“黄色”加勒比人送回 St.Vincent 和驱逐肤色为较深的“黑色的”加勒比人到洪都拉斯（Gonzalez 1988,p.23）。在洪都拉斯，加勒比的小部分人开辟了他们到贝利兹的道路，在那儿，白人害怕一场加勒比人领导的暴动，试图把他们从奴隶中驱逐出去或是他们自己远离奴隶（Burdon 1934,p.60-61）。Post-emancipation 移民包括小数量的从中国和印度来的契约性的（indentured）的工人，来自危地马拉的 Kekchi 和说 Mopan 玛雅人的群体，以及墨西哥尤卡坦 Yucatan Peninsula caste-war 的大量的难民潮，他们十九世纪中叶的到来使贝利兹的人口翻了一倍。从尤卡坦来的难民包括那些自我认同为白人或西班牙人的人，是或者出生在西班牙，或者出生在当地的洗礼过的“纯”西班牙后裔；印度人，同化种族的标签强加（inposed on）给当地人，即那些自我定义是许多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或属于一些政治团体的成员的当地人；并且 Mestizos 和印度人 还有在西班牙和 Mesizo 边界的民族类型很快模糊了，因为二者都开始运用“西班牙人”的自我设计来将自身区别于印第安人和说英语的人（English-speaker）（Judd 1989）。

在后解放 (Post-emancipation) 时代, 获得自由的奴隶被认为是克里奥人, 从而将他们区别于移民。并且到 19 世纪末, 白人也开始声称“本地的”地位 vis-à-vis (我们对我们) 移民西班牙 (immigrant Spanish), 他们觉察到作为对手的英国的殖民官员, 对后者的优越地位渐渐的反感 (Judd 1989 : 113)。在 19 世纪的后期, 一个精致的神话包围着西班牙最后一次攻击殖民地, 1789 年, St. George Caye 这场战役, 助涨了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对“本地的”地位的要求。奴隶主因为这场战争, 描述轻便武装的被殖民者和他们的奴隶已经并肩战斗, 以驱赶较好武装的西班牙海军离开贝利兹的水域。奴隶主声称“给予奴隶的表面的束缚(galling yoke)是如此的宽松和易于激励 (他们的) 黑人保卫他们的主人, 在他们的这一边他们以最坚决的勇敢和忠诚进行战斗” (Burdon 1931 : 272)。一个纪念这场世纪战斗的假日的机构强调: “各色”人种 (声称是在参加这场战斗的人的后裔) 的每个人的“本地的”地位。这个假日最小化了奴隶制的残忍和剥削, 向奴隶和奴隶主对贝利兹的忠诚致敬, 并且嘉许 (credited) 他们使贝利兹地域从西班牙人的手中摆脱出来。

然而, 20 世纪期间, 克里奥或“本地的”认知已从“越来越少暧昧的指黑人” (Judd 1989 : 107)。在 19 世纪 20 年代, Garvey 的泛黑人进步联盟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的贝利兹分支中的有色人种和黑人成员唤醒克里奥特征去呼吁作为“本地人的”权利 (Judd 1992 : 305)。在 19 世纪 60 年代, 组织发展联合黑人联盟的年轻的克里奥人, 从黑人在美国的权利运动中获得灵感, 制造同黑人特征的克里奥“同义的 (synonymous)”特征 (Judd 1992 : 308)。他们同时致力于磨掉在有色人种和黑人类型之间的区别, 以及建立可以联合克里奥任何加勒比人的一个平和的边界出非洲裔贝利兹人特征。

## 集合为一个国家

随着 19 世纪移民逐渐更充分的合并到殖民的劳动领域, 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经济的环境中与那些穷困的克里奥人平行: “他们是没有力量的, 欠他们雇主的债, 被阻止拥有和控制他们自己的土地, 并且从参加政治和贸易中被排除在外” (Wilk 1986 : 75)。19 世纪 30 年代和 19 世纪 40 年代, 共同的不满引起他们超越种族边界整个殖民地组织起来, 导致殖民地第一劳动工会的形式。普通工人联合会 (General Workers Union--GWU) 站在反殖民的立场, 谴责因英殖民主义而带来的劳动阶级的赤贫, 它的结论是控制着贝利兹经济的伦敦 (London-based) 公司 (Bolland 1987 : 9)。在 1950 年, 当克里奥的中产阶级活动家组织人民联合党 (the Peoples United Party--PUP) 以推进朝向贝利兹独立的运动, GWU 给予 PUP 领导权以背后的支持, 因此很快共同倾向于联合会的广泛殖民地的组织作为它的党的推进器。

独立运动的浮出使贝利兹国家 (它可以要求它从英国和危地马拉——是一个声称由西班牙那儿继承贝利兹地域的所有权的领国——的独立) 的建构和运动成为必要的。带着这合并所有地域的居民为一个国家和为独立而最大化政治支持的双重目标, PUP 领导者们推进一个多样化种族的策略: PUP (reached out to) 西班牙, 加勒比, 以及各种各样的玛雅社区 (被地理性的和象征性的远离于权力的中心)。沿着克里奥, 合并先前的边缘的人口, 这个运动是一个谨慎的策略, 既然没有类型能代表一个绝对的人口的主体。1964 年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 当贝利兹被认可国内的自治: PUP 赢得大选和掌握了大多的国家权力。

在执政中，PUP 曾经进一步证实了多元主义者的国家的轮廓，介绍象征性的转换，是从在贝利兹庆祝 St.George.Caye 时，已经奖励他们由历史的基础位置中放置出来，在古远时期( antiquity )和加强它在它所声称的对有争议的地域的掌握，向锚定( anchor )贝利兹国家的发展中，PUP 强调贝利兹的“ 玛亚人的根 ”，贝利兹的首都从克里奥大本营迁移到 Belmopan , Belmopan 是在国内为 Mopan Maya 命名的一个新的镇；并且在 Belmopan 新的政府建筑被设计为象征一个古代的玛雅人的广场。更进一步，假日的定立把给西班牙和加勒比的荣誉转给了圣乔治日( St.George )，成为几个国家性的假日中的一个。尽管 PUP 遭受到反对党捍卫英殖民主义和与克里奥人在创立贝利兹的传统的核心角色的挑战，当英国提供的堡垒保证去反击持续的危地马拉的要求时，PUP 成功地在 1981 年取得了贝利兹的独立。

### 多元民族主义：加强民族的多样性

在差异和相似性被基础性建立在殖民时代种族关系时，后殖民时代文化在官方的差异和相似性的结构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思想，伴随民族和文化的联盟，替代了种族的检验。后殖民的贝利兹政府定义贝利兹为多民族的。独立后不久，被本文引用的、由教育部定义的、学校教科书中的一段介绍，清晰的表明了政府的多元主义国家建设和它的文化及民族重心，而非种族的方法。这一段文章定义贝利兹国家为“ 多样性的 ”包含于它的“ 多样性文化伴随的 ”“ 不同的习俗和传统 ”。然而，这个国家同时代表在这多样性中的“ 联合 ”；所有的“ 文化 ” 共存在一个社区中，贝利兹被敦促“ 寻求联合实体 ”。从种族向民族的转换，反映了注意力从种族或有色人种主义和不平等的关联转移，再次将注意力聚焦在文化的品质——产生平行的民族的地位和象征性的平等。每一民族被视为拥有它“ 自己的 ” 语言、食物、音乐和“ 传统 ”。的确，Wilk 论述说，民族学被官方的允许，反映它得以“ 表达的 ” 文化是一个焦点；民族的情绪与经济连接的关注，面临政府的敌意( 1993 : 3067 )。

当教科书定义贝利兹为“ 多样性的 ”( 产生于 PUP 执政期间 )，反对党也逐渐用多元主义者的术语定义国家。早期立足在 Anglophile 克里奥的中产阶级中的对 PUP 的政治反对，已经寻求描述 PUP 的反黑人(Shoma ,1987;Bolland 1991 :98)。然而，尽管 PUP 安稳于来自国外和以玛雅人占多数、起主要作用的种族地域的广泛的支持，它也保持克里奥人劳动阶层的跟随。1984 年，联合民主党第一次赢得大选，它已延伸它的主张到合并所有的民族类型的组成成分，接受他们的轮廓为“ 民族的 ” 类型。1984 年运动表明，他们认识到了“ 许多民族和文化的群体的贡献 ” 组成了贝利兹，并称他们为“ 我们国家的脊梁和它使整个历史进步 ”( UDP 1984 : 13 )。继而，在目前，PUP 和 UDP 都注意穿越民族的界限的成分。因为没有一个政党成为与一个单一民族的联盟，党派政治没有被认证为民族政治，( 因为在一些加勒比国家中他们被认为是民族政治 ) ( Bolland 1986;1991 )。对贝利兹文化多样性的拥护已经促成成为他的国家特征中一个核心的方面。

作为在中美洲的加勒比国家，我们国家充当了一个桥梁和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庇护所，我们必须保护这种独特性 ( PUP , 1989 )。

“ 多样性 ” 因而被定义为一种财富；贝利兹人对它的接受，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种被其他国

家模仿的“模型”。这种定义贝利兹是一个国家所依据的观点，是有它的特别的民族多样性的轮廓和它的民族多元性的庆典及合法化。

后殖民强调“文化的”和“民族的”差异，在定义贝利兹的性质时，与之平行的，是独立后第一次人口普查，也详析运用“民族的”标签（这种标签过去常用以标明贝利兹人中的差异）。用于贝利兹人口普查中的加勒比种族类型的标准，开始得到介绍；这一标准开始被转换到较好的反映贝利兹民族分类术语和规则中：1980年，黑人类型标准被克里奥标签替代。并且种族类型代表 Mestizos, Maya, Kekchi, 和 Garifuna (更倾向于自我设定为加勒比人)。这些类型代表种族和文化的分类。尽管“其他的”类型仍被设计为一种种族的类型。人口调查进一步转换的分类的术语，反映了文化的而非种族规则的差异化，并且他们被设计为民族的标签（见表 1）。许多类型反映出觉察到了文化的和语言学的差异：克里奥人，Garifuna，德意志/丹麦 Menanite，Mestizo, Maya Mopan, Kekchi Maya。其他类型把他们的成员联系到“古代的地域”（Segal 1993）：中国人、印度人和 Lebanese 人。一种有色设计保持：白。但即使这样，也被文化的概念和民族的差异复杂化。Menanite 在 1950 年移民到贝利兹，以保持在他们的社区和其他贝利兹社会之间很大程度上的分隔。在先前统计中划分为白人，1991 年他们被在白人类型中重置以及被单独分开，而反映了他们文化的独特性。

表 1. 贝利兹人口的民族分类（1991）

| 民族类型                         | 按类型划分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
|------------------------------|----------------|
| Mestizo                      | 43.6           |
| 克里奥人                         | 29.8           |
| Kekchi Maya                  | 6.6            |
| Mopan Maya                   | 4.3            |
| 其他的玛雅人                       | 3.7            |
| 印度人                          | 3.1            |
| 门诺派德意志人/丹麦人教徒<br>(Mennonite) | 3.5            |
| 白人                           | 0.8            |
| 中国人                          | 0.4            |
|                              | 0.1            |
| 其他                           | 1.0            |
| 没有填答/不知道                     | 0.0            |

然而，从种族到民族——文化设计的转化不必要的降低对差异结构的强调。政府已提出关于文化的两个前瞻。在介绍中引入的教材中，文化伴随“习俗和传统”。然而，在其他的教科书中，政府以文化为一个活跃的进程——“包括习得的行为一代传递给一代”（教育部 1984：40）。前一个定义有更受欢迎的前景，特别参照民族文化，尽管后一个定义在国家文化的结构中坚持摇摆。作为习俗和传统的民族文化的 sense 得到官方标注——他们自己传授坚定的和独特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尽管贝利兹人有许多的困难，在把他们自己放到不模糊的唯一的民族的类型里。例如，我在 1990 年采访的一个年轻人解释说，他的父母说的语言禁止任何声称在它的身上为玛雅人（的语言），他也不肯定他能够正确的自称他的西班牙人特征。尽管许多贝利兹人共同遭遇到是属于一种形式抑或另一种的困境，在民族联盟里的清晰性和模糊性没有、并且也不能被官方的对于民族的特征和差异设计所意识到；除了“其他”和“不知道”以外，没有官方的分类术语能够为那



些父母属于两个不同民族的人所依据，或者那些已经学习和合并各方面（特征）到多元“文化”中去的人。依据祖先来对贝利兹的民族群体进行区分的呼吁进一步的加强了民族的标签命名清楚的群体。甚至，尽管文化的革新持续的出现，按照第二段课本中所说的，这些革新常常是通过民族传统的资料或民族祖先的实践被灌输为合法的和有意义的。

尽管这些具体化不是继承国家多元主义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些因素仍然证实了关于文化和特征的观点——这种观点，简单化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僵冻了的本应活跃的社会进程，固定了边界、实践、意义和这些边界所包括的个人。文化和民族标签地具体化便利了他们的理性化，民族的刻板印象化的行为、能力、或者趋势，被归因为特别的被一个类型中的成员视为共享的“物质”。比如说，Garifuna 被认为在语言方面有特别才能地民族。作为少数群体，他们在学习将他们整合进去的较大的民族的语言时被限制，特别是克里奥语和西班牙语。进一步说，许多 Garifuna 已经寻求通过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职业——这种职业需要一定程度的英语——的向上的运动。一些得到许可为种族 Mopan 和 Kekchi 的社区服务的 Garifuna 教师，已经学习了 Mopan 或 Kekchi 语言。Garifuna 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常常被其他贝利兹人提及，但是对这一现象的通常的解释忽略了他们的民主和经济环境实践的必要性。取而代之，Garifuna 被描述为拥有天生的习得语言和教育的倾向。其他类型的人被近似的视为拥有天生的暴力、不诚实、必须的苦干、或懒惰，尽管这种归类是把类型同说话者的特征和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强调了差异和特性，伴随着典型化理性的视角：民族差异逐渐被视为自然的、固定的和绝对的。

这一回顾中，贝利兹的个案某种程度上从 Segal 对特立尼达岛（Trinidad）殖民地的描绘中区分了出来，在特立尼达岛，“尽管‘混合’与‘种族’联系，它仍没有转换、消灭或创造他们。”（1993：85）在贝利兹，尽管当前的“民族”类型构成是由于不同的种族“起源”的“混合”的结果，那些标签也被视为标志坚实的人民“类型”差异，这些人们共享的独特的“物质”——是在过去各种有独特性的“物质”联的结果——并且代表“纯种”、整合各种类型到“混合”关系（穿越目前存在的边界）中。过去的“混合”被理解为已经产生独特的混合物和区分及揭示这些类型目前的成员的文化。

### 综合民族主义：谋求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和特征

政府的官方多元民族主义——该主义定义贝利兹民族为多民族组成，支持民族差异的概念；但是，同时政府觉察到民族差异的危险，其甚至可能导致分裂和在被定义为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竞争。在多元主义者的模式里，政府面临两难的国家建构：当证实民族差异，政府看见一种将那些不同的群体附属到一个国家需要。朝着这个终点，贝利兹政府已经做出尝试去建立一种 overarching、包含国家文化的综合模型，是指所有的民族群体对之贡献和所有的民族群体可以共享的模式。

当在介绍中引入的一段学校课本中的话，强调官方对多元民族主义在贝利兹的议程的支持，它也显露了一个与综合民族主义相平行的议程，后者以通过整合国家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来建立一个贝利兹的国家文化和特征为目标。教科书中的这一段文章申明贝利兹国家他的“自己的丰富的文化”由他的民族群体的遗产中衍生出来，正如“贝利兹作为民族和个人”的创造力。他谴责殖民“分隔和管理”政策，意在通过在贝利兹内禁止“国家的文化互动”来抑制产

生国家文化所需要的创造力。文章暗示创造性的国家文化综合可能通过消灭“殖民遗留的偏见”和鼓励穿越民族边界的互动而便利后殖民时代。“国家文化”更不断的被视为开放的和活跃的，仍然在创造的进程中(Bolland 1987: 12)。

然而，从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中，挪用特殊的“习俗和传统”为一个综合的“国家的文化”的结构尝试，已经遭遇阻力。许多贝利兹人已经拒绝采纳与民族群体联系实践，这一实践事将他们联系到非他们自己的、他们惧怕身份在那些居首要地位的群体之下。例如，一些克里奥人已经建议以克里奥的语言（广泛的说于克里奥社区之外）取代英语作为一种新的国家语言。当他们描绘这为朝向文化的非殖民化的一步时，其他民族团体已经视这一建议为一种新的语言帝国主义的类型。进一步说，民族团体的成员常常坚持要保持对他们“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所有权。当克里奥裔赞扬贝利兹的Garifuna音乐家创作的puna音乐为“一个贝利兹人对世界音乐的贡献”时，愤怒Garifuna已经坚持定义puna为一项Garifuna的创作。这种对综合的国家计划的抵制，反映了多元主义者国家建构的较大的成功。

也许在综合主义国家建构中，最广泛的尝试被反映到PUP独立后，立即开始的建立一个国家博物馆的计划。首先的是在那些赞同一种多元主义者的方法和那些更赞同综合主义的方法之间的执政PUP中有不同，每一个民族群体在博物馆里有它自己的空间，并且那些更赞同综合的方法，反对如此“部落主义”为国家建设任务的“副产品”(Price and Price 1995)。综合方法的支持者普遍在计划这个博物馆，并且结果设计显著的下了差异——也模糊了刻画差异的线条——“通过持续的融合，磨合和再联合印象”(Price and Prince 1995: 102)。例如，博物馆计划者挪用与“不同背景”相联系的艺术物资、和并置他们去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的仓库”。他们避免在民族类型的基础之上排列图像和信息，寻求通过并置“在整个博物馆里不同的组合照片肖像表明不同的贝利兹‘类型’”来替代创造一个“万花筒的影响”。这“变化的脸孔的安排”将象征“卓越的贝利兹民族联合”(Prince and Prince 1995: 101)。普遍的博物馆计划者的目标，表现为代替和创造一个独特的贝利兹“物资”和“文化”的综合。

然而，官方的朝向综合民族主义的努力，与政府多元民族主义计划相比，被发展的较少。博物馆计划(museum projects)仍被意识到；并且其他的创造一个共享的国家特征和文化的进步，已获得有限的成功。政府的最大成功在于：定义一个国家的文化包含她的核心价值观的特征。这一价值观断言，所有的穿越民族界限的贝利兹人共享“热爱和平和民主。贝利兹的国歌唱到它是“民主平静的庇护所”，并且它由市民执政的历史、“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以及两个主要政党权力的和平交替，已经被作为贝利兹的和平、民主天性的证明而被引用(Fernandez 1989)。这图景已经被用于把贝利兹人绑在一起，是“同样的”；将贝利兹区别于中美邻国、特别是区别于被弃为暴力和反民主的Garifuna。

## 霸权民族主义：种族化国家

官方综合民族主义以及多元民族主义者的议程都遭遇到一种非官方民族主义项目的挑战——更窄的定义国家。尽管官方的多元主义者的论述，定义贝利兹组成民族的群体为平等的、完整的国家的一部分，许多贝利兹人不同意不同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贡献的平等，不同意不同民族群体在国家内适合的地方的平等。自从在国家中荣誉的一定空间被理解为，指向权利和权力所控制的资

源，在贝利兹各组成的群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一些尝试，是通过一些群体推行民族霸权模式，即，优先将他们自己的种族和民族特征与国家联系起来。这些关于包含贝利兹领导权的斗争陷入清晰的对种族的论述，该论述联系类型特征、生理表征和刻板行为的基础为一个先天生物性或基质的假定。联系不同的类型来排序特征，这些论述把特殊性——种族化的——民族“类型”更加集中的联系到国家和边缘化其他民族（或种族）。

民族霸权主义正在被克里奥人积极的推进，同时Garifuna惧怕他们在“拉丁统治”的政体之下附属于西班牙。几十年来，这种关注已被危地马拉人要求得到贝利兹和它的选择反复威胁入侵供以燃料而日益增强。危地马拉国家的对她国内的暴力镇压，以及危地马拉黑人的社会和经济的边缘化已经在贝利兹引起注意，并作为入侵将带来什么的例子。作为一个结果，危地马拉的威胁已经被克里奥和Garifuna贝利兹人在种族的条款中经历过：原先的UBAD领导者断言，“当危地马拉突然起意时，它的声明总是会做些什么的，这是使贝利兹黑人敏锐的意识到他们的肤色，因为危地马拉是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社会”（Amanadala, 22 November 1991）。当PUP迫切要求并获得独立，一些贝利兹黑人害怕危地马拉将会入侵贝利兹和强加一个种族主义的政权，在这政权之下，他们将被推到这由“西班牙”危地马拉人居首要地位的种族等级的最底层。怀疑西班牙贝利兹人可能支持或站在强加这样的一个政权的一边，一些克里奥人和Garifuna人质问西班牙贝利兹人对贝利兹民族的忠诚。然而军队入侵的威胁并没有发生，贝利兹独立的第一个十年，成千上万的中美洲人，由于本国的赤贫、压制和政治暴力而被推出国内，移民到贝利兹寻找一片土地、和平和更高的报酬。主要是从危地马拉来的，许多人在贝利兹被划分成西班牙人。移民恶化了失业率（估计在 20%），对工资水平施加了向下的压力，为主要是城市克里奥人的贝利兹人移民美国的高比率添油加火（Vernon 1990）。同时，这些在克里奥人Garifuna人中产生一定程度的人口运动，这种运动在非裔加勒比和贝利兹人口的中美洲部分之间的“民族平衡”已经发生转换。1991年的人口普查已计算出 40%的人口为克里奥人，33%的是Mestizo（西班牙），1991年普查区分出 44%人口为Mestizo人，然而区分出作为克里奥人或Garifuna的人总共只有 36%（统计局 1992）。一些克里奥人和Garifuna人相信这些人口统计学的改变提高了在未来“拉丁人主宰”的可能性，甚至不用危地马拉的军事入侵。在 1987 年政府移民建议委员会(government-appointed Im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警告说：

[移民] 能够获得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比例的增长。当移民成为如此显要的多于本国人口，历史给了我们教训。适于用来提醒我们的两个例子是南非和伊斯兰……

[因此移民政策应该是] 聚焦在：伴随贝利兹需要的人力技术的人们的移民 [并且] 一种能够吸收到国家结构中去种族特征。（移民建议委员 1987；引入到 SPEARhead, 1987）

选作“教训”的移民人口，以大量的数目征服了种族定义的本国人口的极端例子，显示出非裔贝利兹人觉察在中美洲的移民的危险。事实上，克里奥和 Garifuna 的人常常遭遇来自西班牙贝利兹人和西班牙的移民的反黑人种族主义。对他们附属于西班牙裔多数群体的潜在的在未来的理解，鞭策着克里奥和 Garifuna 的领导人们建构和固化一种非裔贝利兹人种族特征的尝试，这种特征能够使两种类型成员联合和运动为针对西班牙裔数量增长的平衡物。1990 年已证明，“非裔贝利兹人的最高层”和国家范围内的非裔贝利兹人的社区，致力于朝向一个联合所有的在贝利兹识

别为具有非洲祖先的人的目标的形式。

伴随着目前增长的就业竞争，对“西班牙”移民的关注和未来“拉丁裔统治”的潜力，也已强化了克里奥和 Garifuna 关于在贝利兹的人的利益和特征的怀疑（Medina 1992,1997；Moberg 1993）。做不到的是、也许不希望的是从中美移民中去区分出贝利兹生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和 Garifuna 贝利兹人，常常质疑所有“看上去是西班牙人”的人的贝利兹特征。他们提到或直接说西班牙裔人为“老外”，就如在介绍中所描述的冲突中那个足球迷所作的。身体表征是西班牙裔的人，或在贝利兹占据公众的地位的右翼西班牙裔人遭到非裔贝利兹要求他们“回家去！”，威胁把他们从酒吧和公共汽车上驱逐出去的的挑战。甚至，因为西班牙和玛雅类型之间模糊的界限，非裔贝利兹人常对那些自我认同为玛雅的人同样运用“老外”标签。这挑战中的含蓄性是一个断言，即只有黑人可以自动的被当作贝利兹人。尽管日常互动穿越了民族边界，非裔贝利兹人正定义贝利兹为黑肤色，同时西班牙裔作为“老外”，把西班牙裔贝利兹人边缘化或排斥出贝利兹民族。

那些被划分为西班牙裔“老外”的人不仅被描述为非贝利兹人(non-Belizean)，也被描述为 un-Belizean 人。他们被刻板化为暴力的和违法的、倾向于犯谋杀和重型罪，以此对比和平的、民主性的贝利兹人。当政府偶尔试图通过建议“老外”可以由教育再进入贝利兹的途径来减轻恐惧，反对者表达了对“老外”是以“太不同的”文化整合入贝利兹民族内的关注，他们的存在威胁辨别贝利兹为一个民族的民主实践。移民委员会号召限制移民到一些人中去，这些人具有“一种能够同化到国家结构中去民族特征”，暗示西班牙裔移民将威胁分化而非同化到这结构中去。然而，当这些归类为“老外”的人被定义为，在文化上过于的不同，而不能配合到贝利兹国家和它的和平、民主的系统中去，他们按照生理特征而在种族的基础上被定性。

这些非裔贝利兹人论述的各方面和实践组成一项民族霸权主义计划，该计划种族化国家，合并黑人显型，许诺和平和民主，并且在贝利兹国家中给予荣誉。朝向民族霸权主义的趋势被反映倒第三党派的讲坛，贝利兹权力国家联合会，在 1992 这一有关同危地马拉的关系的政治辩论的期间，从UDP中分裂出来。在一次为吁请基金而访问在洛杉矶和纽约的贝利兹人的期间，NABR 的克里奥领导人呼吁改变贝利兹的法律以允许“全部的”贝利兹人参加投票。他们解释他们的目标是把贝利兹人注册到“全世界”并且允许他们在贝利兹选举中投票，以抵消“上千的老外”涌入贝利兹和持续在选举中的（向上）滚动。一位NABR领导人警告说：

此刻，我们正在与一种情形战斗，指一种令人绝望的并且不确定我们会赢得情形，因为 PUP 政策已经充斥着外国人的选单 (electoral lists) .....我们估计可能目前在贝利兹有 100,000 的中美外国人，占据着贝利兹的工作机会并且组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贝利兹人明显的不理解领导权和对我们的国家的控制权的重要性是什么。这场战斗将要持续未来的 5 年，谁来统治贝利兹？贝利兹人还是外国人？这才是关键。

虽然 NABR 已不能吸引足够的建构它自己同主要政党平等关系的资金，它已经吸引一些公众的支持。它的政治目标，挑战联合一种努力，即：让所有的贝利兹地域上的居民成为一个贝利兹民族的努力。自从最早的向着独立的方向组合一个国家的尝试以来，这一目标已被控制。相反，NABR 建议定义非裔贝利兹人为贝利兹国家的构成、无论他们在那儿定居，而它同时否认住在贝

利兹的西班牙移民的贝利兹民族性。

## 讨论

将贝利兹地域与贝利兹民族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已使一个国家成了一个为定义种族、民族的差异及共性的竞技场（舞台），这正是通过他们连结到国家中或从国家中排除出去的特权化或边缘化特殊民族和民族特征。很清楚，在贝利兹同一化和特殊化的进程被完全的联系在一起，并且尽管不同的国家主义者的计划，使他们通向不同的道路，种族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特征都仍然是被建构和被制造去互相吸收。多元民族主义用亚国家的多样性术语来定义贝利兹国家性，识别和断定亚国家特征，鼓励连结合并民族的差异，融合同期的国家资源特征的各种形式。尽管多元主义者的关于国家建构的前景规划，运用精炼及非精炼的文化描述，扼要表述的前景已主宰了贝利兹文化多元主义流行结构，为民族差异的种族化和内部民族的竞争做出贡献。同时，综合民族主义的计划鼓励贝利兹国家融合他们民族文化的各元素到一个新的贝利兹国家文化中去，继而淹没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到一个贝利兹国家的特征中去；国家的“同质性”被建议作为矫正民族“差异”可能性的危险的方法。民族霸权主义，不断努力以达到“非官方的”、被贝利兹人关注的、一个有潜力的拉丁裔居首的未来，倾向于给贝利兹国家贴上黑肤色或非裔贝利兹人的特征。它扼要表述了民族差异、民族特征，并且，使它与由综合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非裔贝利兹人单独拥有的贝利兹和贝利兹人的和平与民主性格相一致的。因而，当那些被划分为“西班牙裔”的人在数量上超过非裔贝利兹人时，非裔贝利兹民族主义者计划建设贝利兹为一个黑人种族。

民族性的扼要表述，已使文化价值观和行为的特别类型被归入特别的种族的“精华”成为可能。这种实在说允许“文化差异”的概念去发挥功能，方法是用相似于排除出某些类型的成员于国家之外的种族主义。Gilroy(1987)和 Balibar (1991) 描述在英国和法国平行的状况，在这两国，分别出现了遭到怀疑的“生物性差异”和“种族纯洁”的观念被“文化差异”和文化整合的观念替代的事实。结果是，特殊的人们的类型被定义为文化差异过大，以至于危及对它妥协的文化传统的整合，而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被容纳。虽然这些被定义为有疑问的群体在文化上而非在种族关系中被组合，他们的独特性仍然被视为与生俱来的、不可以数量战胜的，危险的。甚至，当这些论述详析文化的差异为问题时，在每一个方面中，如在贝利兹，被视为威胁国家文化整合的人们（people），在以生理表象为基础的种族的术语中可识别，也被识别出来。因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特征被合并在一起，并且国家的所有（national belongings）被种族化了，尽管过去常包含国家的而排斥“外国人”的术语强调文化的或民族的联盟。

如果在国家中优先的位置能够服务于较强国家控制和便捷的通向国家资源的队伍，向霸权种族主义发展的步子将代替一种非裔贝利兹人阻止他们潜在的成为数量增长的民族的附属的尝试，那些数量增长的人居住在贝利兹是可以归入西班牙人的。尽管这一策略是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部分，这场斗争正在被实现于一个种族化的结构中，该结构差异被认识为精炼的、绝对的和不能逾越的。这种结构毁坏了反对持种族主义的人的努力。（比较。Domiguez 1995）：它是种族差异的想法合法化，以差异为不可战胜的，并且导向种族主义者针对“看上去是西班牙人”的人的实践。以至于非裔贝利兹人对于一国种族化的论述具有说服力，她打开了转换种族霸权主义形式的门；事实上，它的对所有人因“同样的”而混入西班牙裔类型的想象，有潜力能够在那些自我

认同、或被他人归类为西班牙人的人的社会和政治的坚固性中运用为催化剂。

最终，任何单独的民族主义者，于争斗的土壤中阻碍竞争着的民族主义的目标而获得成功是不太可能。贝利兹民族和它的国家的文化将浮现出来——并且继续受到考验——通过介于社会的代理人(social agents)提倡的、竞争着的国家主义者目标之间的、正在进行着的对峙，同时，作为贝利兹人商讨他们的利益和特征。然而，多元民族主义越强调民族差异，它就为种族化霸权民族主义提供了越多的支持。

#### 注释：

1. 近年，随着中国移民和调查的增多，中国人类型已经非官方的渐渐与“外国人”地位联系起来而非是贝利兹国家民族中的一个成员。
2. 然而，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种族和民族特征的建构而存在的舞台。几种贝利兹的群体定义他们自己为较大的、蔓生的国家边界的、散居在外的人的一部分。
3. 贝利兹殖民历史的介绍是一个必要的总结。在 Bolland 和 Shoman 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完整的相应论述。
4. 在贝利兹的居民的木刻 (woodcutting) 是一个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反复商讨的题目。几个条约符合针对英国殖民者所运用的权力,但是辨别了西班牙对该地域的所有权。
5. 在这一上下文中，标明贝利兹的经济精英组成小数量的白人家庭是重要的。一旦在文化和政治的生活中，正如经济生活，他们现在在文化的和政治的背景中“实践可见”。
6. 这里，“印度”指出生在印度或祖先生于印度。
7. 例如，Wilk (1993) 探索通过国家美人游行来建构国家的坚固性的尝试，争论这一游行暴露和吸引了正是他们寻求去抹煞的分裂。然而，Wilk 建议非官方的综合民族建构的尝试，已经比官方的方面更加成功：例如，没有国家的干扰，贝利兹已经定义了一个概括出来的和重新合并的多样化“民族皮肤”元素的“民族的皮肤”。
8. 在危地马拉主要的民族类型的成员区分他们自己为“Mestizo”，但是他们在贝利兹被定义为“西班牙人”或“Mestizo”。
9. 估计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移民数字范围由 40,000 到 60,000 (Stone 1990,p.102)。1991 统计调查仅有 25,548 个生于国外的人，代表 13.8% 的贝利兹人口。
10. Vernon(1990)估计有 60,000 到 70,000 的贝利兹人移民自美国。
11. 例如，在贝利兹中心的一个村镇最近所作的一项研究认识到作为“外国人”的社区显示他们许多的居民是 Mopan Maya 人，他们从南部贝利兹迁移而来。(Stone 1990)
12. 这种族化的进程没有完全否认多元民族贝利兹构筑的建构：克里奥和危地马拉常识识别出那些作为合法的贝利兹人出生和抚养于他们的本地域的西班牙裔贝利兹人。
13. Stone (1994) 注明“西班牙”人——一个具体化另一个——自从十七世纪以来，当西班牙海军威胁贝利兹殖民地时，已刻板化为暴力的和危险的“其他人”。
14. 当两个政党都没有联系于一个单一的民族成分时，每一个政党都积极的巧妙运用组合民族的问题来吸引支持者或贬低对手。当 UDP 没有公职时，它的新闻报道听上去是关于“外国人”认罪、篡夺土地、因 PUP 而得以注册参加选举、且引导他们自己一种“非贝利兹的”态度的警告。因它的这一部分特点，1989 年，PUP 的国家运动标语是“贝利兹的第一”。
15. 同样重要的，在聚焦于未来介于西班牙裔和非裔贝利兹人之间潜在的不平等，这计划失败于：遭遇被标明是

在目前被贴标签是白人的小的类型和所有其它贝利兹人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另一国家主义者的论述，不成比例的白人享有经济资源和白人在贝利兹国家中的成员资格的控制被保障和合法化，该论述给予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投资者一个在这国家中的荣誉的位置。（参考书目从略）

## 【学术纵览】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2000 年学术工作简介

#### 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

- ISA 工作论文 2000-001 费孝通：《九十新语（丁集）》  
ISA 工作论文 2000-002 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  
ISA 工作论文 2000-003 周 型：《Y 村民族的调查与思考》  
ISA 工作论文 2000-004 费孝通：《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  
ISA 工作论文 2000-005 于长江：《小民族 大课题——从赫哲族说起》  
ISA 工作论文 2000-006 周 星：《四大门：北方民众生活里的几种灵异动物》  
ISA 工作论文 2000-008 谢立中：《走向“目的/形式理性化”：论当代中国体制改革的实质与后果》  
ISA 工作论文 2000-009 张 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ISA 工作论文 2000-006 邱泽奇：The China's Emerging Internet Society

#### 二、学术讲座

1. 题目：**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arket Forces**  
主讲：Prof. Jonathan Turn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时间：2000 年 9 月 12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2. 题目：**数码纪录方式 (DV) 与田野工作**  
主讲：吴文光教授  
时间：2000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3. 题目：**Producing Guanxi----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主讲：Prof. Andrew B. Kipnis  
时间：2000 年 10 月 13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4. 题目：**一个没有婚姻的社会----影视与民族志**  
主讲：蔡华教授

时间：2000年10月20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 三、主办学术会议

第五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时间：2000年7月，地点：福建 厦门）

### 四、开设课程

| 学期             | 授课教师 | 课程内容   | 课程类别   |
|----------------|------|--|--------|
| 1999-2000 学年   |      |  |        |
| 第二学期           | 刘世定  | 乡镇企业研究   | 研究生选修课 |
|                | 李建新  | 环境社会学  | 研究生选修课 |
|                | 刘援朝  | 语言社会学专题  | 研究生选修课 |
|                | 麻国庆  |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著选读   | 研究生必修课 |
|                | 赵旭东  | 政治法律人类学  | 研究生选修课 |
|                | 马戎   | Ethnicity in China<br>(Dept. of Anthropology, UCLA, the US, Spring Quarter)                    | 研究生选修课 |
|                | 王铭铭  |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br>(Dept. of Anthropology, Univ. of Chicago, Spring Semester) | 研究生选修课 |
| 2000 - 2001 学年 |      |  |        |
| 第一学期           | 马戎   |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 研究生选修课 |
|                | 王铭铭  |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社会   | 研究生选修课 |
|                | 高丙中  | 象征与宗教人类学   | 研究生选修课 |
|                | 赵斌   | 文化传媒社会学原著选读  | 研究生选修课 |
|                | 刘能   | 社会运动理论   | 研究生选修课 |

### 五、博士后出站报告

| 姓名 | 工作报告题目                       |
|----|------------------------------|
| 周炜 | 西藏城乡居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及文化交融 |
| 王兵 | 群体认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

### 六、主要研究成果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 第 14 卷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马戎，龙山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第 15 卷 《中国乡镇组织调查》，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第 16 卷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第 19 卷 《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潘乃谷、周星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第 22 卷 《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潘乃谷、马戎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专著、文集、译著、编著（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郭志刚，*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Peng Xizhe and Guo Zhigang, eds.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英国), 2000 (本人为副主编并撰写其中第 10 章：Family Patterns)  
 王铭铭，《非我与我：王铭铭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 5 月版。  
 王铭铭，《王铭铭自选集》（新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王铭铭，《甜蜜的悲哀》（与胡宗泽合译，第一译者、序言作者），北京三联书店。

#### 论文、译文（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费孝通，“21 世纪人类学面临的新挑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5 期；  
 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费孝通，“关于西部的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 2 期；  
 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民俗研究》2000 年第 3 期。  
 费孝通，“中国现代化：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在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费孝通，《九十新语》丁、戊、己集，？（工作论文？  
 ？《北京大学社会婚姻拥挤研究》（合写），《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3 期。  
 郭志刚，“Population ageing in China” (with Du Peng), in Philips, D.R.ed.s., *Age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s and future tren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94-209.  
 郭志刚，“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人口研究》2000 年第 1 期。  
 郭志刚，“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思考”，《人口与经济》2000 年第 6 期。  
 郭志刚，“生育的数量与进度”（邦加茨、费尼著，郭志刚译），《人口研究》2000 年第 1 期。  
 郭志刚，“时期生育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人口与经济》第 1 期。  
 郭志刚，“中国 90 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中国人口科学》第 4 期。  
 郭志刚，“中国婚姻拥挤研究”（合写），《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3 期。  
 郭志刚，“中国近期生育水平的研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编，《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 郭志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分析”(与杜鹏、刘金塘合写),载《中国老龄问题对策研究》,华龄出版社。
- 李建新,“倒金字塔理论与21世纪中国老龄社会”《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3期;
- 李建新,“后人口转变论质疑”,《人口研究》2000年第6期;
- 李建新,“环境转变论与中国环境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 李建新,“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口研究》2000年第2期;
- 李建新,“人口与环境的理论研究及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3期;
- 李建新,“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转变及特点”《人口学刊》2000年第5期;
- 李建新,“稳定低生育率与生育政策调整最佳时期”《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 李建新,“稳定低生育率与现行生育政策”,《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年第6期;
- 李建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压缩型’环境问题特征”《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 李建新,“中国西部大开发—人口与计划生育要先行”(与于学军、陆杰华合作)《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年第2期;
- 刘能,“乡镇运行机制的一次解剖”,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
- 刘世定,“乡镇财政收入结构和运作机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
- 刘世定、邱泽奇、刘能,“湖北省仙桃市毛嘴镇调查”,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北京:华夏出版社
- 刘世定、邱泽奇、刘能,“浙江省玉环县陈屿镇调查”,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北京:华夏出版社。
- 麻国庆,“House Division: Divided yet Continued and United---A Study of House Divis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3, Autumn 2000.
- 麻国庆,“比较社会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
- 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2000年第1期。
- 麻国庆,“国际交往合作中的文化因素”,《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8月31日。
- 麻国庆,“汉族的家观念与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 麻国庆,“汉族的家观念与实际”,《应用心理研究》第5期,2000年春,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 麻国庆,“借女生子”,《读书》2000年第2期。
- 麻国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日报》理论版,1999年12月29日。
- 麻国庆,“秘密社会与传统汉族社会结构”,《思想战线》2000年第3期。
- 麻国庆,“农耕蒙古族的家观念与宗教祭祀”,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00年。
- 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 麻国庆,“社会结合的纽带——日本的神社与中国的庙宇”,林振江、梁云祥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日本》新华出版社,2000年。
- 麻国庆,“中国人际关系的解剖图”,《中国青年报》2000年2月22日。
- 麻国庆,“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结合”,《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 马戎,“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 马戎,“新疆喀什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马戎,“导言”,《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马戎,“导言”,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马戎,“关于民族的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5-13页(人大复印《民族研究》2000.3)。
- 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32-143页(部分转载于《新华文摘》2000年第12期)。
- 马戎,“论民族意识的产生”,《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14-18页(人大复印《民族研究》2000.5)。
- 马戎,“内蒙古北部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合写),《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马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发展模式”(合写),《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马戎,“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马戎,“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 马戎,“中国居民环境意识与环保态度的城乡差异”(合写),《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
- 马戎,“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经费问题”,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马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双语教学”,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马戎,“中国乡镇政府对基层学校的管理”,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钱民辉,“99'高考综合评价及相关思考”,《徐州教育科研》2000年第3期。
- 钱民辉,“‘走向田野’也是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学年鉴 1995.7~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钱民辉,“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体系”,载马戎、龙山(加)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 钱民辉,“孔德的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10期。
- 钱民辉,“论学生与教育革新的关系”,《徐州教育科研》2000年第5期;
- 钱民辉,“西部人才开发的高起点与西部基础教育质量低下的关系”,《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 钱民辉,“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变迁”,载马戎、龙山(加)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 钱民辉,“学校教育处在危机中,变革势在必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 钱民辉,“中国残疾人教育与社会发展”,载马戎、龙山(加)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 钱民辉,“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载马戎、龙山(加)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 钱民辉,“中国女性教育资源与区域社会发展”,载马戎、龙山(加)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 王铭铭,“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南方文坛》2000年第3期;
- 王铭铭,“灵验的遗产: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之二),《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 王铭铭,“他者的意义——现代人类学的后现代性”,《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
- 王铭铭,“危亡与超生:1896年东南沿海的超度仪式”,《民族学研究集刊》2000(1),总83期。
- 王铭铭,“文化与21世纪”,《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纳日碧力戈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铭铭,“寻找一种人的观念”,《读书》2000年第3期;
- 于长江,“人口少,课题大——赫哲族为例的人类学思考”,《中国民族》,2000创刊
- 于长江,“西藏曲水县拉热村社去调查”,《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等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 于长江,“云南丽江鸣音乡多民族社区研究”,《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等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 赵斌,“小写的文化: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天涯》2000年2月。